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亨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407 期

2024 年 9 月 15 日

目 录

【新疆研究专辑】

【论 文】

动荡之源：新疆三区革命的国际背景

邵玮楠

新疆三区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杜 瀚、杜飞舟

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

徐玉圻、顿时春

国民党政府对新疆三区革命的政策

黄建华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区村长选举——主要基于和阗区的考察 黄建华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 57 期《高空中的女性：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与劳工》

Hwasook Nam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 58 期《另外一半如何运行：移民及其劳动力的社会组织》

Roger Waldinger、Michael Lichter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动荡之源：新疆三区革命的国际背景¹

邵玮楠²

内容提要：1944 年新疆三区革命的爆发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1933 年盛世才主新后，他的亲苏与反苏、苏联的对新政策、美国在新疆势力的扩张、国民政府的因应使新疆成为了各方势力角逐的舞台，二战的爆发及其发展则更使这个舞台变得纷繁复杂。由于不甘心失去新疆利益，以及不愿意看到国民政府、美国挺进新疆，苏联成功地利用新疆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促成了三区革命的爆发。

三区革命是新疆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深刻改变了当时新疆的政治生态，而且对其后新疆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三区革命的爆发原因，学者们也做了许多论述和探讨，总体说来，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观点：（1）苏联主使；³（2）盛世才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⁴（3）伊斯兰教和突厥民族主义的传播。⁵笔者认为，此三说都指出了部分原因，但过多地把目光投射在了苏联和新疆本身。事实上，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缘环境，研究这一时期的新疆问题不能仅局限在新疆地方和苏联，更要考量其后的国际背景。同时，历史事件的发生是一个延续性的过程，在它以最终的面貌呈现出来之前，往往会经历长期的积累演化。若要探究三区革命的爆发原因，就有必要回溯到盛世才主新时期，从苏联势力全面深入新疆开始，观察各方因素对新疆时局的作用过程。因此，本文试探讨 1933-1944 年的这十二年间，国际时局——尤其是后来二战的局势变化是如何影响中苏美新三国四方的政治决策，进而影响这期间的新疆局势，又是如何演变为少数民族的反抗，最终导致了 1944 年的新疆危局。

一、

杨增新主新时，苏联通过直接与新疆当局订立条约取得了一定特权。1933 年“四·一二”政变后，在苏联的襄助下，盛世才击败张培元和马仲英，取得了新省军政大权。作为交换，盛世才给予苏联贷款、派驻顾问等各项权利，新疆对外（包括对南京政府）交涉及重大事件、重要官员任免都必须告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兼全权代表，省政府一切重要政策的实施不仅要报备总领事，还需相关各厅局顾问的同意才能执行。⁶同时，新疆以苏联为模板进行了改革，自此，苏联

¹ 本文刊载于《西域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37-48 页。

²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³ 就笔者所见，纪大椿（《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载《新疆近世史论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189-213 页）、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曹国芳（《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的兴起》，《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苏联与三区革命前夕新疆边境地区的社会政治局势》，《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杜瀚，杜飞舟，（《新疆三区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9 年第 1 期）和 David Wang（*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 1944-1949*,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等人持此观点。

⁴ 朱培民，《新疆革命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年；徐玉圻：《新疆三区革命史》，民族出版社，1998 年等著在论及新疆三区革命的爆发时，都认为盛世才及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是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

⁵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0.

⁶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七册，台北：兰溪出版社 1980 年，第 3541 页。此外周东郊的《新疆十年》（作于 1948 年）、新疆民众编的《盛世才祸新纪略》油印本，1945 年）等书也均有提及。

势力全面深入新疆军政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国民政府则在黄慕松和罗文干先后宣慰新疆失败后，无奈地承认了盛世才的地位，对苏联在新疆的存在也无能为力。

抗战爆发后，大量苏联援华物资经由新疆运往关内。藉此机会，苏联也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1938年1月，盛世才以哈密一带局势不稳，物资缺少安全保障为由，请求苏联援助。这正中苏联下怀，6月，苏联红军一团（即红八团）¹进驻哈密，锁住了甘肃入新交通的咽喉。实际上，苏联出兵哈密不仅是为了保护运输线，更与国际形势密不可分。进入1938年后，抗战逐渐趋向长期化，为了获得稳定的后方，国内有人重提西北开发，而此计划的实施势必导致中央政府对新疆产生影响，这是盛世才和苏联都不愿看到的；同时，日本势力不断西进，对外蒙古、西伯利亚和新疆均构成威胁，因此，红八团的进驻主要是为了维护苏联自身在新利益。事实上，以军事力量支援盛世才和保障自身利益是其时苏联的惯常手段，红八团也并非盛世才时期第一支进入新疆的苏联红军。1933年12月至次年1月，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全力支持乌鲁木齐当局与马仲英及其他回族部队作战，以使新疆不会被变成反苏活动的基地”²，伪装成归化军的两支苏联红军从伊犁和塔城先后进入新疆。1934年4月，又有毛兰诺夫骑兵团在喀什协助省军作战。张培元自戕和马仲英流亡苏联后，前两支红军撤回国内，毛兰诺夫团则留驻乌恰，成为苏联红军长驻新疆的开始。1937年9月至10月，为帮助盛世才剿灭马虎山和麻木提，康斯坦丁诺夫又率军一团入新，配合毛兰诺夫团平定了叛乱。嗣后，康团撤回苏联，毛团则以边防大队名义驻扎南疆。³此后，1940年11月，通过《锡矿协定》，苏联又获得了新疆省境内的筑路权和矿产开采权等多项利权⁴。而国民政府因为担心在新疆问题上向苏联施压会导致苏联减少甚至取消援助，不得不暂时保持沉默。⁵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缺乏准备的苏联损失惨重，无法再给予盛世才有力援助，但却未打算放弃在新疆的权益和对新疆事务的干预，这引起了盛世才的不满和疑惧⁶，苏联的失利也使他怀疑苏联的实力，于是考虑另寻出路。1941年，盛世才以打击反苏分子为借口，在新疆制造了“陈、武阴谋暴动案”⁷，清洗异己。同时，以打击托派为名暗中清除苏联在新势力。苏联主持建立的边务处⁸首当其冲，“边务处的人员除焦文儒、张成儒、李文杰、康昇等四人外，其余以武佐军为首先后全部被逮捕入狱……总电台主任许祖德（留苏学生）也遭逮捕死在狱中。”

¹ 其名为一团，实则是包括了步炮骑和一个空军支队的混成旅，详见范承渠：《苏联红军进驻哈密事闻》，政协哈密委员会编：《哈密文史资料》第1辑，1987年，第64-68页。

² Directives for Operating in Xinjiang,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 Folder 17. Item. 166. File 502, p. 5-6, 转引自 Mirovitskaya, R&Ledovsky, 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hinese Province of Xinjiang in the Mid1930s, Far Eastern Affairs, (004 Vo. . 35, (2007): p. 93.

³ 纪大椿：《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新疆近世史论稿》，第191页。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2页。

⁴ 条约全文见“中华民国外交部”编印：《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台北，“外交部”，2001年，第48-51页。

⁵ 约翰·加弗著；王静译：《新疆战场》，《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4页。

⁶ 据《唐纵日记》记载：“盛世才之新疆省政府民政厅长李溥霖与其警务处长李英奇密告盛世才过去之阴谋，谓盛之过去反正之动机，系因苏联欲在新疆扶植一维吾尔领袖打倒盛，盛故投归故国。”《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4年11月2日，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468页。

⁷ 即“陈培生、武佐军阴谋暴动案”。武佐军和陈培生时为新疆边务处第一、第二副处长，盛世才宣称，在两人的主使下，成立了一个阴谋暴动组织，企图推翻他的统治。在盛世才统治新疆的十余年间，阴谋暴动案贯穿始终，包括“1937年阴谋暴动案”、“杜重远阴谋暴动案”、“1942年阴谋暴动案”、“黄、林阴谋暴动案”四次大规模及一系列相对较小规模的“阴谋暴动案”。“陈、武案”可被视作“杜重远案”的延续。但实际上，所谓“阴谋暴动案”均是盛世才一手炮制出来打击政敌和异己、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其实并无其事。

⁸ 1936年，由新疆边防督办公署成立，苏联边务局派来人员主持，专做新疆境外情报工作，盛世才名义上任处长，但一切权力操于苏方之手，它是苏联在新疆的情报机构，1942年后撤销。

¹ 此后，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的四弟盛世骥突然身亡，死因不明，这给盛世才提供了契机，他声称盛世骥的死是“延安与莫斯科共同指挥的”政治阴谋，“最终目的是推翻现政府，并且建立一个与重庆完全无关的新政府。”²于是，他逮捕了包括毛泽民、陈潭秋在内的在新中共党员与其他各界人士五百余人，苏联军事顾问拉托夫等亦因此被调回。³盛与苏关系的破裂开始明朗化，而这种变化与盛世才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接触颇有关系。

二、

早在1941年冬，盛世才就已与国民政府密通款曲，“迨三十一年（1942）中央大员前后来迪化者有梁寒操、沈鸿烈、何竞武、毛邦初、朱绍良。尤其是朱绍良曾先后来迪化五次。”⁴5月，盛世才派张元夫和五弟盛世骥为代表前往重庆，与蒋会谈。7月1日，朱绍良、翁文灏等携蒋介石致盛世才的亲笔信飞抵迪化谈判。7日，经过之前的联络和劝说，盛世才最终上书蒋介石，为自己过去联苏联共的行为进行了辩白，并表示“今后绝对不能再与此类假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合作，誓以至诚，拥护钧座与国民党之领导，效忠党国”⁵。对新疆内附，蒋介石极为振奋，在7月1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若不有此五年来之对倭血战，则今日之新疆决不能使盛世才忏悔归诚，于此可证明公理与正义必能战胜一切矣！”⁶苏联的态度自是截然相反，只是中苏同为反法西斯盟国，又值斯大林格勒战云密布，暂时无法武力报复，只能先以外交手段干预。6月27日，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捷卡诺卓夫曾到访新疆。按盛世才自述，捷卡诺卓夫此行即在于对其做最后的拉拢尝试。在双方的四次会谈中，捷卡诺卓夫宣称，他的到访是盛氏修复与苏联关系的最后机会，并且所有背叛党和马列主义的人都不要指望不受惩罚，因此盛世才必须审慎地决定新疆与苏关系⁷。由于盛世才不为所动，7月9日，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谈时，**潘友新即将莫洛托夫致盛世才函的复本呈交给蒋**，函中列举了盛世才过去亲苏的种种行为。潘友新同时称，盛世才过去对国民政府的作为，与今日对苏联的态度，均系错误，其中可能有敌对势力背景⁸。对此，蒋和唐纵均认为，这是苏联在无法阻止盛世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离间策略，希望以此动摇国民政府对盛世才的信任。⁹

苏联之所以担心新疆内附，除了担心在新疆拥有的利益外，更与其将新疆视作卫护西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的屏障有关。1941年4月13日，由于苏联无视中国的抗议，**与日本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并中断了对华援助**，中苏邦交受到重创，而同时，中美联系却越发紧密。1941年4月16日，罗斯福宣布立即给予中国援助：“已核准以若干现有之军火转让中国，现已可供中国，此外，政府将命令制造商定造新军火，供给中国。”¹⁰25日，又向中国提供了五千万美元平准基金借款，1942年3月，美军中将史迪威出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

¹ 李国卿，《新疆边务处的成立和撤销（1936-1943）》，《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6页。

² Allen S. Whiting & Sheng Shih-ts'ï, *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239.

³ 周东郊，《论新疆问题》（下），《西北通讯》第七期。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九册，第4831页。

⁴ 周东郊，《新疆十年》，第120-121页。

⁵ 盛世才，《三十一年七月七日第一次上蒋主席书》。转引自《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22页。

⁶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第61-62页。

⁷ 关于盛世才对这四次会谈的内容的阐述，详见 Allen S. Whiting & Sheng Shih-ts'ï, *Sinkiang: Pawn or Pivot*, pp. 244-254.

⁸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435-437页。

⁹ 《唐纵日记》，1942年7月9日，第289页。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04页。

¹⁰ 《美国宣布立即增加对华援助》，《申报》1941年4月17日，第2版。

同月，美国同意给予中国五亿美元财政援助，6月，中美签署抵抗侵略互助协定¹。因此，国民党西进新疆后，美国有可能随之而来。尽管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美苏并肩作战，但基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考量，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天然鸿沟，苏联对美国始终深具戒心。²

对苏联而言，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由于新疆矿藏丰富，地处欧亚枢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对新疆地区的兴趣确是与日俱增。1942年9月，罗斯福特别代表威尔基以新疆作为其访华的一站。10月26日，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局的庄莱德（Drumright）在备忘录中写到，尽管美国目前在新疆没有侨民和财产，但由于中亚面临轴心国的威胁，美国应考虑派员在那里观察轴心国的动向，并考察中亚的地理、交通、政治、军事以及经济。³同月，美国战略情报局派海军中校梅乐斯（Miles）为驻华代表，梅乐斯则提出希望在拉萨、迪化设立工作站⁴。对美国的想法，早就受到谋求在新疆以美英势力制衡苏联的国民政府的欢迎。⁵对中国的意图，美国人心知肚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表示：由于苏联在迪化有领事馆，所以中国人认为美国领事官员在那里的派驻会是一个不错的政治战略。⁶鉴于新疆的重要性，美国很快接受了中国的建议。1943年4月1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柯乐博（Clubb）就任美国驻迪化领事馆首任领事⁷，这标志着美国对新疆的兴趣转化为行动。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加紧了对盛氏的笼络和对新疆的控制。1943年7月12日，何应钦向蒋介石递交了《收复新疆主权方略》，提出：“为巩固西北边防之目的，应乘此中苏同盟之时机，收复新省主权。”⁸16日，蒋介石召见潘友新，告之：“凡有关新疆省之事，深盼能由贵国中央政府直接与敝国中央政府洽商协议，不可再与新疆省当局逕行交涉。”⁹8月29日，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在朱绍良等人的陪同下，赴迪化宣慰¹⁰。对宋美龄的来新，盛世才表示这是对他的重视与信任，因此他将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¹¹9月8日，吴泽湘出任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主持新疆外交，新疆设在苏联的五领馆¹²也被收归中央。11月28日，盛世才被任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至此，在形式上新疆的内政外交都已归属国民政府。

盛世才允准国民党中央党政人员在新活动，是以维持他“新疆王”地位为前提的，因此，虽然他曾勉强答应中央军入新，但又多方加以限制¹³。同时，盛也担心驻哈密的红八团会威胁他的统治，所以1942年10月5日，他向苏联新任驻迪化总领事普式赓递交一份备忘录，要求除外交人员外，所有苏联人须在三个月内离开新疆。据盛世才的回忆，对此，苏联起初并不打算接受。但在强硬的交涉后，11月14日，普式赓转达了莫斯科的最后决定：所有苏俄顾问、专家、军事人员等，都将在限期内回国。¹⁴

¹ 以上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见《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39-433页。

² Davi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 1944-1949*, p. 66

³ Memorandum by Mr. Everett F. Drumright of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October 2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以下简称 Frus), 1942, China,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687-694.

⁴ 《唐纵日记》，1942年10月29日，第376页。

⁵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31, Frus, 1942, China, p. 694.

⁶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31, Frus, 1942, China, p. 694.

⁷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31, Frus, 1942, China, p. 695.

⁸ 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38-439页。

⁹ 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41页。

¹⁰ 据《唐纵日记》1942年9月14日，蒋介石原先曾打算亲自“往晤盛世才，以新疆机场有俄兵数百驻守，故未成行，由夫人前往宣慰”，第302页。

¹¹ 盛世才，《月革命的回顾与前瞻》，《新疆》1943年4月12日。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九册，第4908页。

¹² 分别为塔什干总领事馆、斜米领事馆、宰桑领事馆、阿拉木图领事馆和安集延领事馆。

¹³ 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九册，第5122-5123页。

¹⁴ 盛世才对这段交涉的回忆详情可见：Sinkiang: Pawn or Pivot, pp. 255-267。参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

三、

苏联从新疆撤出军队和顾问,并非打算彻底退出新疆,只不过是迫于国际时局,才有所隐忍。1942年7月至1943年初,由于西线战事紧张,苏联不愿多生事端,更关键的是,苏联担心日本进攻西伯利亚,导致腹背受敌,所以需要维持与中国的关系,目的是使中国继续拖住日本。¹

在苏联而言,新疆有着巨大的地缘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不欲他人染指,对盛世才的政治转向、国民政府以及美国的进入,自然大感不满²。1943年5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必须采取措施,以使盛世才失去在新疆的权势”,代之以“忠于苏联的新疆土著居民代表组成的政府来掌管省内政权”³。所以,尽管除外交事务外,苏联在新疆的公开活动基本销声匿迹,但事实上,苏联从未停止对新疆的谋划,尤其是对德作战有所改观后,苏联在新苏边界制造了一系列事端。据驻新特派员公署的统计,自1942年12月底至1943年10月,新苏边界共发生了记录在案的各类事件64起,其中伊犁区27起,塔城区6起,阿山区16起,三地合计49起,占总数的77%,而伊、塔、阿三区正是后来“三区革命”的中心。同时,发生在1943年2月以后的共62起,占总数的98%,⁴也即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可以想见,西线形势的改观,使苏联得以对新疆当局采取一些报复行动。

除了不断增加的边界争端,1943年6月,阿山爆发了乌斯满⁵领导的变乱,并得到了苏联和外蒙古的大力支持⁶。他们不仅向乌斯满提供武器和粮草,还将在苏联受训两年的达列力汗派回阿山与乌斯满合作,随同的还有以波波夫少将为首的12人顾问团⁷。为了平息变乱,盛世才不得不将主力调往阿山,以至省内防务空虚。在此情况下,盛世才感到苏联巨大的威胁,只能同意中央军开入新疆⁸。这些部队在1943年至1944年陆续开入新疆。

国军入新后,以哈密为据点,分布迪化老满城、镇西、吐鲁番等要地,对盛世才形成了一定的压力⁹。更重要的是,在此前后,国际局势有了新的转折。1944年1月,苏军解除了德军对列

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47-448页。“中华民国外交部”编印:《苏联对新疆之经济侵略》,1950年,第76页。《唐纵日记》,1943年5月25日,第358页。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九册,第5109页。《唐纵日记》,1943年5月25日,第358页。

¹ Memorandum by the Counselor of Embassy in China (Vincent)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October 7, Frus. 1942, China, pp. 245, 实际上,直到1944年底,尽管其时日本已经被大大削弱,但是苏联和美国仍然对日本进攻西伯利亚的可能表示出了担心,“11月末,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如果日本部队选定当月发动进攻,他们有能力楔入东西伯利亚,切断苏联的生命线西伯利亚大铁路,进而孤立滨海各省”。因此,在1945年之前,苏联人压倒一切的考虑是防止日本攻打西伯利亚。可见文安立:《冷战与冲突: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12页。

² 周东郊,《新疆十年》,第125页。

³ B·巴尔明,《1941-1949年间苏中关系中的新疆》,巴尔瑙尔,1999年。转引自厉声,《三区革命运动中的“二次革命”及其背景》,《石河子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

⁴ 详见《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211-214页。

⁵ 乌斯满,约出生于1895年,新疆富蕴人,哈萨克族,原为普通牧民。1940年参加富蕴、青河哈萨克牧民暴动。后曾为反对盛世才的亲苏政策和苏联矿业考察团在阿山的活动,率领小股武装活动于青河县新疆外蒙古边境一带。1943年任阿勒泰哈萨克族解放委员会委员长,后任阿勒泰人民临时政府委员长。1946年7月任新疆省联合政府委员兼阿勒泰专员。1950年与尧乐博斯等发动叛乱,1951年4月在迪化被枪毙。

⁶ 徐玉圻主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21页。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册,第5189-5192页。孙福坤,《苏联掠夺新疆纪实》下,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第5页。

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编,《新疆烈士传》第四辑,新疆人民出版社,第126页。王柯则认为,顾问团的人数是14人,成员包括代号分别为“白房子”和“蓝房子”的苏联顾问和外蒙顾问。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5页。

⁸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九册,第5123页。

⁹ 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译:《新疆三区革命资料汇编》第3册,1959年,第19页。李帆群,《盛世才投靠国民党的前前后后》,《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1页。

宁格勒的包围，差不多同时，在苏联的支持下，外蒙古与新疆省军在阿尔泰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本已糟糕的中苏关系更趋恶化。对于这起冲突，美国人相信它被极大地夸大了，因此不打算介入¹。这样一来，盛世才感到投归中央似乎不能保证他在新疆的权位，要想达到这个目的还是要仰仗苏联²。他的行动也愈发可疑。

1944年4月17日，盛世才突然拘捕省委刘效黎、程东白和省委党部委员兼中央训练团主任何耿光等十余人，而这些官员都是由国民政府任命或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派的³。其后，随着国民政府在豫湘桂战场上一溃千里，盛世才的行动也逐渐升级。6月26日，盛世才逮捕了迪化教育界人士及学生一百五十多名⁴。8月11日晚，盛世才又将黄如今、林继庸等中央派新人员诱捕，是为“黄、林案”⁵。接着，他上书斯大林，表示“悔过自新”，但斯大林直接把信转给了蒋介石⁶。这可能出于两个原因：第一，美国的协调。1944年春夏之交，由于新疆问题，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与美国维持盟国团结的政策背道而驰⁷，因此，罗斯福在4月8日给蒋介石的信中要求对新疆问题冷处理，不要有任何可能有损盟国联合作战的行动和观点⁸。6月，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为特使访问苏联和中国，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调解中苏矛盾。可能与此有关，在华莱士访问莫斯科之前，斯大林曾对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表示，尽管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战斗不力，但他是当时情况下的最佳人选，因此应当给予支持⁹。华莱士到中国后，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蒋介石表示如果美国愿意促成中苏会谈，他愿“在中苏间建立更为良好之关系”。第二，在经过盛世才上一次的背叛后，苏联对其已不再信任，甚至认为他是改善中苏关系的一大障碍¹⁰。所以，迫使盛世才下台更符合苏联的利益。¹¹

苏联的意图与国民政府不谋而合。早在1944年3月，国民政府军令部就已意识到“盛世才须调离新省，另派他职。”¹²8月15日¹³，朱绍良受蒋介石委任，飞赴迪化劝说盛世才主动辞职。19日，由于苏联拒绝援手，更因为入新国军已占据要津，盛世才走投无路，只得辞去新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29日，国民政府同意盛世才辞去本兼各职，转任农林部长，同时裁撤边防督办公署，以吴忠信为省政府主席。在吴忠信正式上任前，由朱绍良代理省政。

四、

¹ 罗伯特·菲斯，《华莱士使华前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八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20页。

² 1943年9月，盛世才在重庆出席了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后，认为国民党内部分裂，不可久持。见李帆群，《盛世才投靠国民党的前前后后》，《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106页。

³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册，第5952页。《盛世才祸新记略二》，第19页。《唐纵日记》，上星期反省录，第485页。

⁴ 详见安勇新，《盛世才监狱一百天》，《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6-137页。

⁵ 金绍先，《国民党反动势力进入和统治新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5-36页。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册，第5955页。

⁶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269页。

⁷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4, 1944, Frus Vol. 6, p. 769.

⁸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April 11, 1944, Frus Vol. 6, p. 772.

⁹ 罗伯特·菲斯著；林海译：《华莱士使华前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八辑，第122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574页。

¹⁰ Davi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 1944-1949, p. 57

¹¹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16, 1944, Frus Vol. 6, p. 806, 三区革命史编写组：《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13页。

¹² 《唐纵日记》，1944年3月29日，第419页。

¹³ 《唐纵日记》中称朱绍良18日赴新，见第455页。《朱绍良年谱》记载为“15日到迪化”，见周开庆编，《民国朱上将绍良年谱》，第35页。Frus中则称朱绍良飞迪化乃是在8月14日，Frus, 1944, p. 806。而罗家伦在《天山逸史零篇》中写有：“一民在重庆，正拟回兰州而变讯达于中枢，13日奉召赴黄山，商定大计后即奉命入新，于14日飞抵兰州，从事部署；15日晨专机飞迪化”。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0册，第6003页。可见朱绍良应是在14日动身前往新疆，15日抵达，因此唐纵所记似误，应以15日为确。

吴忠信主政新疆，是蒋介石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吴忠信系同盟会的老党员，为人处事老成持重，自 1936 年起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熟稔边政事务。因此，蒋介石认为，由吴忠信出掌新疆，内外均可相信。10 月 5 日，吴忠信在迪化西大楼前召集省府各厅处所属职员训话，宣称要以“天理、国法、人情”作为今后处理公务的尺度，并表示“中苏两大民族有历史传统友谊，新疆地居中苏交通要冲”，是以“对苏外交，亲善邻邦实为当然之理”¹。

但是，与吴忠信的愿望相反，对国民党在新疆地位的确立，苏联并不乐见。长期以来，苏联一直对新疆颇有觊觎之心。二战爆发后，远东格局为之一变，美国更多地介入亚洲事务，并推动中国进入四大国行列，此种情势下，为了确保重夺中东铁路和旅顺口的控制权，并在外蒙古建立一个苏联控制下的缓冲国，斯大林的对新政策是设法促成一个听命苏联，或者至少是亲近苏联的新疆地方政权²，因此，尽管盛世才被迫去职，但国民党控制新疆依然不能令莫斯科满意。然而，无论是考虑到其时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还是从战后世界格局的走向和苏联对自身根本利益的追求出发，在新疆事务上与中国翻脸相向乃至兵戎互见都绝非高明的主意。所以，在欧洲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时，借助第三方力量来实现对新疆的筹划最符合苏联的现实需要。而新疆长期存在的纷繁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为苏联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在运用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对新疆少数民族进行动员之前，苏联也曾尝试用共产主义来宣传和动员，但收效甚微³。事实上，对于运动的组织发动来说，“民族主义和种族或宗教总是比社会阶级的绝对律令更可靠，其原因就在于它们能促进团结一致和集体认同”⁴，特别在新疆这样长期存在极端宗教思潮和民族隔阂的地区。⁵

得益于盛世才时期的亲苏政策，从 1934 年开始，到四十年代初，有三万名新疆青年在苏联接受了各种培养教育⁶，为后来的宣传动员提供了很有利的基础⁷。盛苏关系破裂后，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人员被迫离新，但外交人员和在新疆境内的五个领馆得以继续工作。借此莫斯科加紧了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宣传和渗透。尤其是自 1943 年开始，苏联采取了多种方式在新疆展开活动。

1. 散发关于民族、宗教认同的传单、手册，这也是苏联采用最多的方式。1943 年 8 月 19 日，吴泽湘致电外交部，称在喀什查获苏联传单及小册子，文字“均系苏联柯文，间有哈、维语文。绝非喀什印刷者”。内容则以“诋毁本省当局，挑拨各族仇视汉族，反对政府”为主。它们的宣传对象主要是维吾尔、哈萨克等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传单中写道：“维、哈、柯等回族（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作者注）同胞们……现在盛督办把你们的武器收去了，企图破坏你们的宗教，而且把你们弄成倾家荡产、人口灭亡的现象”，希望回教同胞“仍然结合在一起，把这种摧残回教、蹂躏人类、侮辱回教的不道德之现象革除。”小册子则更富煽动性，开头即为：“为民族复兴解放而前进新疆的民众！在被督办压迫下的维、哈、柯、乌、塔、蒙等同志们！”随后大量列举盛世才和汉人的罪状，包括“把无数的回教者屠杀和逮捕了”；“使回教人的生活日趋贫困”等，最后号召成立回教人的政治集团、武装，启发回教文化、宗教，阻止内地人到新疆等

¹ 吴忠信：《吴忠信主新日记》，1944 年 10 月 5 日，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西北民俗文献》第 10 卷，线装书局，2006 年，第 90-91 页。

²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

³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Davi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 1944-1949, p. 102.

⁴ 西德尼·塔罗著；吴庆宏译：《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 2005 年，第 8 页。

⁵ 纪大椿：《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新疆近世史论稿》，第 194 页。

⁶ 马大正、许建英，《“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 80 页。

⁷ 正如 David Wang 所分析的那样，“在海外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往往对他们接受教育的国家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一旦他们领导或者掌控某个运动，这种倾向性将会影响他们的政治选择。”见 Davi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 1944-1949*, p. 94.

¹。8月25日和9月25日，塔城地区和喀什又分别报告发现反盛反汉的哈、柯文传单²。可见，这一阶段的宣传中，苏联除煽动民族、宗教矛盾以外，斗争的另一个主要矛头是盛世才。然而盛世才去职并非苏联对新政策的最终目标。10月，伊宁警察局查获维文宣传册《我们为什么作斗争》，内称新疆自古以来称为东土耳其斯坦，是维吾尔、塔兰奇³、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的世居地，四百万新疆居民中，这几族人口占四分之三，民族性的精神发源于中亚细亚，而非中国。同时宣称即便是不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和俄罗斯族，也和这几个民族一样，在“物质上、精神上和民族种族各方面与汉族始终不发生关系。”但是“汉族官僚们，由遥远的中国，移来百万的红胡子……把我们强迫送往内地……而汉族红胡子们，安居我们的房园，占住我们的财产，强奸我们的妇女。”因此，少数民族应当发起反抗汉族的暴动。⁴

2. 组织民族、宗教团体和组织。在新疆的多个地区，都出现了受苏联影响不同程度的组织。1944年5月，曾经留学苏联的阿布力米提·哈吉也夫、买提尼亚孜·哈利等人在塔城县建立了三个战斗小组。同时，在苏联驻塔城领事馆的帮助下，杜别克、恰勒根巴也夫等哈萨克青年也在塔城县成立了以哈萨克青年为主的战斗小组，进行秘密活动。7月10日，在苏共党员阿不拉·热玛扎诺夫的安排下，阿不力米提·哈吉也夫将塔城的三个战斗小组合并⁵。1944年4月在伊犁成立了包括12名核心成员的伊宁解放组织，该组织直接受苏联驻伊宁领事馆领事达巴申和副领事波列索夫领导，其中的成员包括阿巴索夫、艾力汗·吐烈、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等人⁶。在中苏、中蒙边境的吉木乃、青河、塔什库尔干，甚至迪化和阿克苏也都有类似的组织，名称也基本一致⁷。在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阿拉木图，叶西艾耶夫建立了“新疆突厥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些组织成立后，利用宗教形式和宗教活动，广为宣传泛突厥主义和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推动了三区革命的爆发⁸

3. 鼓动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移民苏联、参加暴动。不仅仅在新疆少数民族中进行民族、宗教认同的建构，苏联人还直接鼓动伊斯兰教民、少数民族或逃离新疆，或参加暴动，或入苏籍。据督办公署报告，仅1944年8月7日和12日两天，就有阿山区哈巴河县牧民约8000人，携带大量牲畜，经萨斯和哈拉哈巴一带逃往苏联⁹。驻苏大使傅秉常就此事曾向苏联提出遣返要求，但为苏联所拒绝：若干避难哈萨克人“系应宗教关系受新疆当局之压迫，故逃避苏境”，“哈萨克共和国政府依照宪法，业予照准。”¹⁰8月14日，苏联侨民帕提赫·莫斯里莫夫和哈萨克牧民艾克拜尔等人在巩哈县乌拉斯台山区成立游击队，并派人前往加仓库勒、加尔图干、库尔拜依

¹ 《新省督办盛世才归顺中央后，苏方即多所策动阴谋，乞中央速示因应方针由》，《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198-199页。

² 《驻新疆特派员公署报新疆喀、塔、和、阿各区警察局捉获苏谍鼓动民变，请转呈委座并请示由》，《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202页。《驻新疆特派员公署呈送苏方策动反动文宣品译文》，《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204页。

³ 意为“种地人”，是准噶尔部控制新疆时由南疆被迁移到伊犁地区垦田的维吾尔族农民。盛世才时期划分民族身份时，他们被划为一个独立的民族，1949年后，根据历史事实，他们被纳入为维吾尔族。

⁴ 《驻新疆特派员公署密呈苏联促使新疆民族解放社散发煽动暴乱维文宣传小册，并请积极禁止由》，《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251-254页。

⁵ 详见徐玉圻主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28-29页。

⁶ 《三区革命资料汇编》第3册，第14页。徐玉圻主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36页。

⁷ 纪大椿，《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新疆近世史论稿》，第193页。

⁸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N. Y.: M. E. Sharpe, c1990, p. 35, 三区革命史编写组，《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8页。

⁹ 《驻新吴特派员电部阿山哈巴沼(河)县牧民逃苏交涉案由》，《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243页。

¹⁰ 《驻苏大使电部，苏外部复查中国牧民自称系因受新省当局宗教迫害而逃苏避难，并云现已受哈萨克当局庇护》，《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250页。

等地号召当地群众加入游击队¹。此外，1943年10月27日，新疆特派员公署在呈递外交部的报告中称：有苏方特务人员“企图鼓动各族暴动”，及“引诱中民潜入苏籍”²。

4. 通过报纸、杂志等媒体宣传。苏联人利用开设在迪化的国际书店，“以廉价方法，大量倾销以伊斯兰宗教为号召之共产宣传刊物，致使无知中民趋之若鹜，日有五六百人拥购。”这些杂志包括乌兹别克出版的《东方公理杂志》和阿拉木图出版的《哈萨克国土》等。其中《东方公理杂志》的主要内容在于“宣扬苏联境内维族人民生活如何富裕、苏联如何保障宗教，并宣传民族思想与民族自由解放。”³

可以看到，在苏联人看来，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而言，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俱是动员利器，而对不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来说，民族主义也足以起到鼓动的作用。

在当时新疆的14个民族400万人口当中，信奉伊斯兰教的有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乌孜别克、回、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兰奇8个民族三百多万人，构成了新疆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有着相似的文化。在盛世才推行六大政策的时期，“将历年来无甚严明界限之民众，一一割离，造成十四个民族”⁴，并提出“发展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文化教育”的口号。1935年起，省立师范设立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民族班，并在迪化成立了编译委员会，编写少数民族文字课本，同时从苏联中亚地区购置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仪器⁵。新疆各地也建立起了各族的文化促进会。这些面向少数民族的文教措施对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有所裨益，也培育了参与者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强化了当时少数民族对民族的基本群体认同和归属感。

盛世才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政策，催生了少数民族对于当局和汉族的敌视。自掌权后，出于对宗教和民族上层人士号召力的担心，盛世才先后逮捕了新疆的阿訇、毛拉、喇嘛、王公等成百上千人，其中包括维吾尔族的阿不都克里木大毛拉、和加尼亚孜，哈萨克族的沙里福汗，蒙古族的西里克、满楚克扎布等知名人士⁶。同时，盛世才还利用召开少数民族代表大会的机会，及制造阴谋暴动案，大量逮捕少数民族群众。

经济上，新疆少数民族的处境也十分糟糕。盛苏关系破裂后，新苏边界关闭，新疆不仅失去了苏联这个农牧产品的最重要市场，而且无法获得生产生活所必需的日用工业品，以畜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无以为生，仰仗中苏贸易的小商业者也生意倒闭，而一部分官吏和投机商则利用手中的权力囤积居奇。⁷

献马运动是经济上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44年3月15日，盛世才下令全疆开展献马运动，总数为一万匹，如无马可献，则需交纳高出市场价50%的现金用以购买马匹。由于马匹是游牧民族的主要生产生活工具，这个命令引发了广泛的不满。

由于盛世才实行的高压政策，在他离开新疆时，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官民矛盾都十分尖锐。有鉴于此，代理省政的朱绍良主张依法释囚、安定人心、实行军民分治，以使新疆各族得从十年桎梏中脱得自由。随后履任的吴忠信也延续了这一思路，认为当时新疆的病根是极权暴政导致的窒息病。所以对于政府的政策失调，当务之急应是以三民主义为依归，增进宗族互信、保障信教

¹ 三区革命史编写组：《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18页。

² 《驻新疆特派员公署请蒋委员长核示如俄民在新不法，应由吴特派员向俄提抗议，并照律办理及呈报中央由》，《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210页。

³ 《驻新吴特派员报部准新省警务处查获苏设国际书店散发共产党宣传书看资料，请转中宣部审查示尊由》，《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228页。

⁴ 《盛世才祸新记略二》，第43页。

⁵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简史》第三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4页。

⁶ 《盛世才祸新记略二》，第49-50页。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册，第3439页。

⁷ 徐玉圻主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8-9页。司马义罗夫·木合买提，《忆三区民族军绥定第一步兵团的诞生及其经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5页。

自由、绥定地方以安民居，维持币信以利民生¹。这些计划的愿望和思路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的新疆却起了相反的作用。盛世才时的高压政策到朱绍良、吴忠信时期突然的放松，为潜在的起义者提供了相当自由的行动空间，得以比以往更多地接触到民族与宗教的宣传动员。

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虽然国民党也曾考虑过运用亲善民族、保障宗教的方式来笼络人心，但最终归于失败。在苏联利用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的动员下，少数民族的暴动倾向已不可逆转。

1944年夏秋，局面对起义者越发有利。6月，英美等国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减轻了苏联的压力。藉此良机，苏军不仅把德国彻底赶出了国境，而且解放了东欧一些国家，并于9月进入德国本土。因此，在新疆，苏联有能力给予起义者更多的支持。与此同时，面对日军攻势，国民党节节败退，顾此失彼，内地到新疆又交通不便，暂时没有能力抽调更多军队入新。而在新疆，吴忠信刚刚履任，诸事未谙，根基未固，也给了起义者可乘之机。于是，1944年11月7日，在苏联国庆日的同一天，伊宁变起，拉开了三区革命的大幕。

可以看到，从盛世才主政新疆到三区革命爆发，新疆时局的每一次巨大转折与动荡都是以国际环境的变动为前提的。尤其是二战爆发后，战局的进展变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美苏新三国四方的关系，进而推及到各自在新疆所采取的攻守态势。其中，尽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这十余年间，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可以说最为深远，但苏联不同阶段的对新政策则在根本上受制于国际局势的发展和中美苏关系的变动。1943年后，基于以上几点因素的考量，不甘心被逐出新疆的苏联以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为工具，对新疆少数民族进行了长期的宣传和动员，最终促成了三区革命的发生。

【论 文】

新疆三区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²

杜 瀚、杜飞舟³

内容提要：新疆三区革命是在盛世才反苏反共，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经济盘剥的反动政策逼迫下，在苏联的策动组织下发生的，是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民族平等和解放的革命斗争。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在革命过程中发生过分裂祖国、反汉排汉的严重错误，但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三区革命；苏联；中国共产党

一、新疆三区革命的起因

从1944年8月中旬的巩哈（今尼勒克县）暴动和11月7日的伊宁暴动开始的三区（伊犁、塔城、阿山）革命，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历时5年之久。新疆三区革命涉及了北疆三个专区28万平方公里土地、25个县级政府和70余万人口，它是抗战临近胜利和解放战争

¹ 详见《吴忠信主新日记》，1944年10月10日，第108-109页。

² 本文刊载于《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第34-44页。

³ 作者单位：杜瀚，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杜飞舟，新疆医科大学社科部。

时期，在苏联支持和我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影响下发生的，是新疆少数民族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民族平等和解放的革命斗争。

1949年8月21日，三区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等人向中共中央汇报当时新疆情况的报告中说：“新疆的两个基本特点和问题：一、民族问题。新疆的民族问题特别复杂，由于历史上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多次的互相屠杀，导致了各民族之间严重摩擦和深刻仇恨，这种摩擦和仇恨在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更加严重和复杂。半个世纪以来，此间的民族运动是在泛土耳其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进行的，目的是想把所有土耳其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因此，此间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尤其是老知识分子中。泛土耳其主义的思想很深。二、宗教问题。此地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对宗教的信仰特别深，因此，教士的势力非常大，人民不知不觉地盲目地尊崇和迷信教士。《古兰经》上规定，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都是同胞，都是一家人，所以，所有的信徒都有一个把天下伊斯兰教人组成一个国家的愿望，很容易把非伊斯兰教人看成敌人，对于压迫民族则更易产生仇恨，而美英帝国主义则利用这些口号来策动挑拨离间的阴谋”。¹阿合买提江等人的这份报告对当时新疆情况的分析是客观的。

辛亥革命后，杨增新主政新疆。杨增新虽本质上是封建旧军阀、旧官僚，但为人精明强干，很有政治头脑和策略手段。由于比较正确地处理和强邻苏联的关系，又软硬兼施地解决了辛亥革命的遗留问题，因此，从1912年6月到1928年7月，虽然内地军阀割据，战乱频仍，但新疆基本上保持了政局的稳定。1928年省城迪化发生“七·七”事变，杨增新遇刺，金树仁主政。金树仁虽沿用杨增新的内外政策，但任用私人，贪污腐败，使本已严重存在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迅速激化。1931年2月哈密暴动以后，新疆陷入战乱之中。哈密的和加尼牙孜联系甘肃、青海的回族军阀马仲英军入新，东疆、南疆各地的少数民族纷纷起事。1933年2月，穆罕默德·依敏发起墨玉暴动，随即攻下和田，成立了“伊斯兰教王国”。当年11月12日，在英国支持下，沙比提大毛拉在喀什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但是，为时不久。1934年2月，从迪化败退到喀什的马仲英军摧毁了“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当年7月，马仲英手下马虎山部进入和田，灭亡了和田的“伊斯兰教王国”。可见在新疆，“双泛”的反动思想虽有基础，但是分裂不得人心，终究是要失败的。

1933年迪化发生“四·一二”政变，金树仁从塔城逃入苏境，回到内地，盛世才主政新疆。国民党中央政府不但迟迟不明令委任盛世才为新疆省边防督办，反而派参谋次长黄慕松和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罗文幹来新，促成占据塔城的马仲英和伊犁的张培元联合反盛，围攻迪化。在这种困难的态势下，盛世才求助于苏联。苏联为了在新疆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亲苏的地方政权，不使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染指新疆，也不使本质上反苏反共的国民党中央政权直接控制新疆，以维护苏联在新疆的各种权益，特别是中亚几个信仰伊斯兰教、操突厥语的加盟共和国的安全和稳定，经过权衡后，决定支持盛世才政权。从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等各方面援助盛世才，帮助盛世才剪除政敌，稳定政权。

苏联的援助不仅对新疆政局的稳定、经济文化的恢复、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又使新疆成为我党和共产国际、苏联之间来往的国际交通线，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王稼祥以及王明、康生、林彪等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就是途经新疆，往返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的。经过苏联帮助，抗战时期我党与盛世才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我党派一批党员、干部来新疆工作，他们在各族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苏联的帮助不是无条件的，而是用新疆农牧土特产品的贸易、石油和有色金属的开采作为回报。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1941年6月的苏德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在困难时期，苏联和我党也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加上国民

¹ 徐玉圻、杜瀚：《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22页。

党中央政府的威胁利诱，惯于投机的盛世才于 1942 年 8 月下旬决心投靠国民党，反苏反共。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党员、干部及家属、子女全部被逮捕入狱。1943 年 9 月 27 日杀害了党的重要干部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迫使苏联在新疆的专家、顾问全部撤退。驻守哈密苏联红军第八团于 1943 年 4 月撤回苏联。新苏之间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断绝，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政治上对各族人民残酷迫害。盛世才统治时期，特别是反苏反共前后，一次又一次地制造“阴谋暴动案”，不但把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逮捕关押，而且把稍有文化知识和进步思想的人也逮捕监禁，严刑拷打迫害，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和宗教上层人士如维吾尔族的包尔汗、刚从苏联回到新疆的阿合买提江、哈萨克族的艾林郡王和任阿山行政长的沙里福汗亲王、回族的大阿訇马良骏、锡伯族的著名学者广禄等人进行长期监禁。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宗教人士和少数民族群众的粗暴干预和侮辱迫害，严重伤害了各族人民的感情。据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统计：“被逮捕监禁者 先后在十二三万之众 瘦死狱中及暗中屠杀者六万人以上。”¹经济上对各族人民残酷盘剥。苏新贸易断绝后，新疆各族人民的必需品，茶叶、布匹、食糖、肥皂、石油、火柴等供不应求，物价飞涨。各族农牧民的农牧土特产品又无人收购，断了销路 因此生活更加困苦。但是，盛世才及其亲信以各种名目强取豪夺，横征暴敛，搜刮了巨额的社会财富和金银珠宝。据《新疆风暴七十年》所载：“1944 年 8~9 月份，盛世才赴重庆时，除三次使用军用飞机装运彼之珠宝外，其亲戚党羽离新时尚调军用卡车 180 辆载，可谓骇人听闻”。²

盛世才政权对新疆各族人民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经济盘剥势必引起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这是三区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苏联的组织策动。1942 年 8 月下旬盛世才大规模反苏反共时，苏军在苏德战争中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因而顾不上反击。但到 1943 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苏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苏联腾出手来在新疆组织策动少数民族推翻盛世才和国民党的统治。因为苏俄和新疆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经贸文化关系，在各方面有相当的权益，这对苏联是有利的；还因为苏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盛世才，盛世才却和苏联反目成仇；更因为 1943 年 1 月，国民党在新疆重建省党部，国民党军政人员大批进入新疆，特别是 1943 年春天美国、英国先后在新疆设立了领事馆，这对向来把新疆视为自己禁脔的苏联来说更加不能容忍。因此，苏联的组织策动是三区革命发生的直接推动力。

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发展，以及抗战时期从延安派来的一批共产党人在新疆的工作，给各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毫无疑问，这个历史的大背景对三区革命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苏联与三区革命

苏联作为中国北方的大国、新疆的近邻，它的动向和政策对于在贫弱的旧中国孤悬塞外的新疆有着举足轻重的直接影响。1943 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苏联即组织策动新疆少数民族进行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1、苏联组织和策动新疆的三区革命

首先，1943 年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成立“新疆突厥民族解放委员会”，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成立“支援东方委员会”等组织，收容从新疆进入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人员进行政治培训和军事训练，向新疆境内秘密运送武器，建立组织，准备暴动。在宣传方面，开始时用共产主义思想宣传鼓动，但因新疆少数民族宗教意识很重而未奏效，后来改为利用新疆的民族宗教矛盾动员

¹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10 卷，台北兰溪出版社 1980 年，第 6057 页。

²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10 卷，第 6046 页。

反汉排汉，推翻盛世才和国民党的“汉人政权”，收到了效果。大量的宣传品用新疆少数民族文字印制出来，通过各种渠道运入新疆，传到少数民族各界人士手中，做好起义的思想舆论准备。

其次，在新疆境内通过苏联驻伊宁、塔城、承化（今阿尔泰市）的领事馆，并由驻伊宁领事馆总负责 发展苏侨 搜集情报 建立各种秘密的地下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是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帮助下，1944 年 4 月 9 日成立的“伊宁解放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情况复杂，主席是来自苏联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阿訇艾力汗·吐烈，大多数成员是少数民族中的大地主、大牧主、大商人和宗教上层人士，像阿不都克力木·阿巴索夫这样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1944 年 7 月，在联共党员阿不拉·热玛扎诺夫的安排下，在苏联留过学的阿不力米提·哈吉也夫等人在塔城成立了“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组织。阿山的哈萨克族早在 1940 年 2 月为反对盛世才“收缴枪支”，已开展了武装斗争。在此基础上又得到外蒙和苏联的支持，1943 年 12 月乌斯曼·斯拉木在阿山成立“哈萨克民族复兴委员会”。1944 年 6 月初从苏联学习回国的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等人参加阿山游击队的领导工作。伊宁、塔城、阿山的三个组织成立后，在苏联驻当地领事馆的指使下，为武装暴动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最后，巩哈暴动和伊宁暴动的发生。1944 年 6 月，斯大林会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时提出：中国政府免除盛世才在新疆的职务对巩固苏中关系有重要意义。6 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从苏联经新疆抵达重庆向蒋介石转告斯大林的要求，并由苏驻华大使潘友新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苏联一方面向中国政府施压，将盛世才调离新疆；另一方面，加紧策动伊宁暴动。1944 年 8 月 14 日，从霍尔果斯口岸苏联一侧受命并携枪支弹药秘密潜回巩哈县乌拉斯台山区的塔塔尔人帕提合·莫斯里莫夫以及受盛世才“献马运动”所迫害的哈萨克牧民艾克拜尔、色益提兄弟，刚从迪化狱中逃回伊犁的维吾尔人艾尼·阿不都拉等人组织了游击队开始与盛世才的军警作战，并于 10 月 7 日攻占巩哈县城。巩哈游击队吸引了驻伊犁的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其准备在东麻扎一带与巩哈游击队作战。在伊宁城兵力空虚而又分散的情况下，苏联驻伊宁领事馆一面要求“伊宁解放组织”加紧做好在伊宁举行暴动的准备，一面派人通知巩哈游击队绕道山间小路攻打伊宁城。11 月 6 日晚，阿巴索夫和苏联红军军官阿列克山德洛夫率一支 60 余人的武装队伍从苏联经霍尔果斯潜入伊宁，当晚成立了由阿列克山德洛夫为负责人的军事指挥部。11 月 7 日凌晨，伊宁暴动发生。城内以阿巴索夫和阿列克山德洛夫从苏联带回的武装队伍为骨干，大批少数民族群众参加暴动，城外有巩哈游击队的进攻。经过激战，11 月 12 日残存的国民党军警及其家属和汉族群众退出了城区。“伊宁解放组织”领导的武装队伍基本上控制了伊宁城区，并宣布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

巩哈暴动和伊宁暴动发生在盛世才即将和刚刚离新、国民党新任省政府主席吴忠信未到和刚刚到任的新旧交接之际，伊宁暴动成功地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

2、苏联支持和控制新疆三区革命

伊宁暴动胜利后，苏联从各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同时也加强了对临时政府的控制。

“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于 1945 年 1 月 5 日通过政府宣言。其中“一、在东土耳其斯坦领土上，彻底根除中国的专制统治”、“二、在东土耳其斯坦境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国家”¹。两点是公开打出的分裂中国的旗帜。其原因一方面是“双泛”思想在新疆有相当的社会基础，临时政府委员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是具有浓厚“双泛”思想的少数民族封建上层人士和宗教上层人士；另一方面是苏联利用新疆存在的民族、宗教矛盾，破坏新疆的民族关系，散布民族分离主义思想，笼统地鼓动推翻汉人政府，反汉排汉等复杂原因造成的。但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 争取民族平等和解放应是三区革命的主流。临时政府委员会的委员和各厅厅长基本上由本地的维吾尔人以及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人担任，其中

¹ 徐玉圻：《新疆三区革命史》，民族出版社，1998 年，第 44 页。

许多人有留学苏联或在苏联学习受训的背景。各厅副职基本由苏联派来的人担任，掌握实际权力，贯彻苏联的意图。

伊宁暴动时的几支主要武装力量基本上由苏联侨民或苏联军官掌握。由乌拉斯台游击队扩充的巩哈游击队的司令是从苏联派入新疆的苏籍塔塔尔人帕提合·莫斯里莫夫。伊宁城内的主要武装力量是由阿巴索夫和苏军军官阿列克山德洛夫从苏联带入并由阿列克山德洛夫指挥的武装部队。伊宁暴动前扼守果子沟公路和天险二台达坂的芦草沟游击队的队长是苏籍侨民俄罗斯人列斯肯。伊宁暴动以后，率游击队攻占霍城、绥定、惠远等城镇确保从苏联边境到伊宁和果子沟公路交通线畅通的是苏籍侨民俄罗斯人莫古特诺夫。1944年11月16日，率领在苏联境内受训的一营骑兵进入伊宁，攻打艾林巴克高地的是1942年起即在苏联筹建“蒲犁解放组织”和游击队的原籍新疆乌恰的柯尔克孜人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苏军军官亚历山大（化名斯坎德尔）和颇里诺夫。任临时政府军事总指挥的最初是苏联军官阿列克山德洛夫，继任者颇里诺夫。颇里诺夫原是白俄军官，十月革命后到新疆，曾在盛世才的“归化军”中任职，1938年回苏联，伊宁暴动后从苏联奉命来到伊犁。任武装力量参谋长的也是苏籍侨民俄罗斯人莫日阿诺夫。

临时政府为了培训部队的中下级军官，1945年1月先在霍尔果斯，后在伊宁近郊的巴彦岱举办了军官培训班，培训班的教官均由苏联派来的军官担任。1945年4月8日在伊犁成立的民族军，完全按照苏联红军的军衔和建制，以颇里诺夫为总指挥，以莫日阿诺夫为参谋长。

重大战役苏联红军直接参加。例如1945年8月底至9月初，三区民族军在精河、乌苏战役中，面对装备精良，数量占优势的国民党新二军等正规部队之所以能取胜，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苏联红军的步兵、骑兵、炮兵直接参战，装甲车和飞机投入作战。除了军事援助外，苏联还有财政和经济援助，这一切都是以三区方面的农牧产品作为补偿的。

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属苏联外交部，临时政府在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的重大事宜要请示领事馆。1944年11月下旬，应临时政府之请，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以弗拉吉米尔·科兹洛夫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代号为1号房子；苏联政府内务部派以弗拉吉米尔·斯切潘诺维奇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代号为2号房子，来到伊宁。临时政府在军事、内务方面的重大事务取决于苏联军事顾问团。苏联通过对临时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实际上控制了临时政府。

3、苏联促成三区 and 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谈

1945年1月底，伊犁方面粉碎国民党军事援伊行动，攻占艾林巴克高地后控制了伊犁地区。民族军组建后，从6月初制定并实施“三线”作战计划。在苏军的大力支持和塔城、阿山等地游击队的协助下，9月初占领了塔城、阿山两个地区，击溃驻守乌苏、精河的国民党新二军等部，将战线推进到距省城迪化只有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此时，迪化的国民党军队只有6个营的兵力，“内无可调之兵，外无一旅之援……迪化危在旦夕。”¹如三区方面乘胜进击，迪化可能陷落，新疆的整个局面将要改观。但是，三区方面对迪化的军事进攻停了下来。9月13日，张治中来到迪化考察以后，10月14日三区方面的代表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在迪化开始和平谈判。

从大规模的战争转为和谈，而且在1946年6月底和谈成功，成立了新疆省联合政府，其主要原因是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牵涉到美苏两国的利益和战后世界的格局。苏联对华政策的改变，决定了新疆问题的走向。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元首举行雅尔塔会议。罗斯福总统为了减少美军在对日作战中的伤亡，提请苏联在欧战结束后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提出以恢复俄国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全部特权为条件。经过商讨，三国元首背着中国政府签定了秘密的“雅尔塔协定”。其中关于中国的条款主要有：维持外蒙古的现状；恢复日俄战争前帝俄的权利，包括将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将大连港国际化，租用旅顺港为苏

¹ 徐玉圻、张克迅：《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5页。

联的海军基地，中苏合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中国须保持在东北的全部主权，千岛群岛交给苏联等。作为交换条件，苏联答应在欧战结束 2-3 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准备与中国政府缔结友好条约。罗斯福总统承诺采取措施使蒋介石同意上述协议。

6 月 15 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通报了雅尔塔协定的具体内容，蒋介石本意是不愿接受这些背着中国政府签订的侵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协定的，但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还是同意派出代表和苏联谈判。6 月 30 日，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等开始谈判。谈判涉及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新疆三区革命问题、中共问题、东北问题，特别是外蒙古地位问题。斯大林明确提出，外蒙古必须独立。宋子文则坚定地表示：“无论如何，吾人不能承认外蒙古独立而存在。”¹ 宋子文和斯大林在外蒙古问题上针锋相对，僵持不下。蒋介石反复权衡后，7 月 7 日，复电宋子文：“外蒙问题实为我中苏两国关系之症结所在，中国今愿以极大之牺牲，展示以最大之诚恳，而求得中苏关系有一个根本之解决。”蒋介石对苏联提出的条件是：“唯望苏联亦能了解余之诚意与志愿，对我国所要求之两点，即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与对中共与新疆变乱不再做任何之支援。”² 中苏之间的谈判直到 8 月 8 日夜，苏联红军已经出兵东北后才达成妥协。即“第一，苏联必须保证东北三省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第二，在苏联支持下被民族军占领的新疆三区必须恢复国民政府的管辖权；第三，中共必须统一于中央的军令、政令之下，苏联宣布不支援中国共产党。对此，斯大林毫不含糊地表示了认可。”³ 8 月 14 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订。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追溯二战和中国抗战胜利前的这段历史 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大林出兵东北对日作战的坚定条件：第一，是在中国东北的权益；第二，是中华民国政府明确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实际上是承认，外蒙古作为苏联附属国的合法地位。这样就可确保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安全并可从中国的东北得到利益。支持新疆的三区革命起初是为了推翻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拔掉其眼中钉和肉中刺。至于今后，这要依据战局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定，或者把伊犁、塔城、阿山三区，最好整个新疆，至少伊犁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成立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或者像外蒙古那样，做苏联的附属国，或者像中亚各国那样做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这是苏联从策动伊宁暴动到 1945 年 6 月底中苏两国开始谈判时的真实目的。和谈开始到 8 月 14 日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到 9 月初，三区民族军在苏联的直接支持下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将战事从北疆扩展到南疆，不仅攻占了塔城、阿山，而且攻占了乌苏、精河，直逼迪化，这实际上是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迫蒋介石接受“雅尔塔协定”。后来，蒋介石被迫在新疆战事失利和苏美两国的压力下妥协。这就是新疆从战争转向和谈，并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的“斡旋”下和谈成功的原因。

和谈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苏联排除了三区内部反对和谈的阻力。1946 年 6 月，张治中和三区方面的代表在《和平条款》附文（二）上正式签字以后，苏联将三区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等人从伊宁用飞机送回苏联。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艾力汗·吐烈是乌孜别克族，生于俄国托克马克的一个宗教世家，曾在沙特阿拉伯等国学习伊斯兰经文和医学。1929 年从苏联到新疆伊宁定居。伊宁暴动前在伊宁最大的拜都拉清真寺任大阿訇。苏联为了利用艾力汗·吐烈的地位和影响，宣传“双泛”思想，以动员伊犁的少数民族起来暴动，选定艾力汗·吐烈为“伊宁解放组织”主席，后来又任临时政府主席和民族军元帅。但当苏联对新疆的政策逐步改变，特别是和谈接近成功的时候，艾力汗·吐烈仍然反对和谈和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因此苏联将其撤换。

在送走艾力汗·吐烈等人的同时，苏联提升阿合买提江·哈斯莫夫为三区方面的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维吾尔族，1914 年 4 月出生于伊宁县。幼年随舅父去苏联学习。1942 年回到塔城、伊犁，因从事秘密活动，被盛世才政府逮捕关押在迪化狱中。1944 年 10 月获释后回到伊宁。伊

¹ 转引自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 2007 年，第 76 页。

² 转引自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第 76 页。

³ 转引自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第 77 页。

宁暴动发生后，先后任报纸编辑、临时政府秘书、军事厅军事科科长。1945年3月底，负责军事厅工作。6月增补为临时政府委员。10月2日，任命阿合买提江等三人为和谈代表，赴迪化与国民政府代表谈判。阿合买提江在代表中虽名列末位，但在和谈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引起国民党内著名外交活动家张治中将军的高度重视。后来，张治中回忆说：“当时三位代表中阿合买提江最年轻，约三十一二岁，但他是历次会议中的发言人，是实际负责者。”¹ 因他年幼时在苏联学习，接受苏联的教育和培训，能忠实地执行苏联制定的政策、交付的使命。同时，又是生在新疆伊宁的维吾尔人，受到伊犁当地少数民族的信任。因此，苏联在送走艾力汗·吐烈以后，即以阿合买提江为三区方面的最高领导人。1946年7月1日，疆省联合政府成立，阿合买提江作为三区方面的代表出任省政府副主席。同时，代表三区方面出任省政府委员的还有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兼省保安副司令）、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兼省政府副秘书长）、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兼卫生处处长）、赛福鼎·艾则孜（兼教育厅厅长）等八人。从此，三区方面的实际权力掌握在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达列力汗以及赛福鼎等人思想进步力量手中。

三、中国共产党和新疆三区革命

由于历史和地缘等多方面的原因，三区革命是在苏联的直接策动下发生的，但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且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与三区革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1、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声援新疆三区革命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1943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1944年以至现在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以及近几年对于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² 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三区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反动的民族压迫剥削政策造成的，对新疆各族人民表示了高度的同情和支持。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飞赴重庆，在和国民党代表的和谈中，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和平解决新疆问题。

2、阿巴索夫等寻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

三区革命的领导人中，和中国共产党人有过直接接触，受中国共产党影响较大的是年轻的进步知识分子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阿巴索夫是祖籍新疆阿图什的维吾尔人。1936-1939年在迪化省立一中和新疆学院附属民族高中班上学时，受到共产党员林基路等人的教育和影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到沙湾县的一个小学任教。1942年，到伊宁女子中学任教并兼伊犁专署翻译。秘密学习进步理论，参加革命活动。1944年4月在伊宁成立“民族解放组织”时，他是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伊宁暴动前夕，他到苏联境内避难和救援，11月6日夜从苏联带回一支武装队伍，7日凌晨参与组织领导伊宁暴动。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政府委员兼内务厅厅长和宣传部部长。伊宁暴动发生后，一度出现严重的反汉排汉现象，阿巴索夫利用自己的职权尽力制止。曾给一些汉族居民发放受保护的证件，将熟识的汉族朋友接到自己家中保护起来。在阿巴索夫等人的努力下，临时政府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攻占惠远后杀害多名汉族居民的拉普桑死刑。在阿巴索夫的提议下，1945年2月24日，临时政府发出了保护汉族百姓的第24号决议。在伊宁暴动初期反汉排汉甚嚣尘上的情况下，阿巴索夫敢于挺身而出制止杀害抢掠汉族百姓的行为是需要非凡

¹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下册，第449页。

²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3页。

的胆识和勇气的。阿巴索夫曾为此受到责难和排斥。为了团结三区内部的进步知识分子，1946年5月5日阿巴索夫在伊宁秘密成立了人民革命党，选举阿巴索夫、艾斯海提、赛福鼎、赛甫拉也夫、伊敏诺夫、安尼瓦尔·汗巴巴、扎克洛夫等七人组成中央委员会，以阿巴索夫为主席。这七人基本上都有在苏联留学或培训的经历。

阿巴索夫不但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和影响，而且和新疆一批向往中国共产党的汉族青年知识分子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和交往。1944年11月7日 张志远等进步青年学生在迪化狱中秘密成立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不久改名为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开展组织活动的同时寻找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1946年6月下旬，三区临时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和平条款，阿巴索夫为参加省联合政府的工作从伊犁来到迪化，通过老同学陈锡华（系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的关系，会见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传委员李泰玉。1946年11月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赴南京前，阿巴索夫与李泰玉商谈利用这个机会，找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表达寻求党的领导的迫切愿望。行前带去了由李泰玉起草的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给中共中央的信。

1946年12月5日，阿巴索夫秘密前往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见到了董必武。阿巴索夫向董老转交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致中共中央的信，表达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迫切愿望。董必武连夜将会见情况和信件电告中央。12月6日中共中央即向董必武回复了由周恩来草拟，刘少奇签发的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考虑派一个得力而不红的同志作联络代表及两个机要人员随阿同志去新”，“其任务只是联络与观察”；“中共愿与新共同盟第一步建立友谊关系”；“新共同盟领导者11人入党事，原则上欢迎，但具体解决须联络代表到后经电报决定”；“新疆工作，应以新共同盟为领导中心”。¹ 12月11日晚，阿巴索夫再次到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与董老会面。董老按党中央指示精神回答了阿巴索夫和信中所提各问题。商定派彭长贵带一部电台随阿巴索夫去新疆，并说：“新疆的进步组织能合并的话经过协商合并起来，这样有利于形成力量，更好的斗争。但在组织名称上，考虑到新疆情况复杂，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接受能力，不宜过早打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² 1947年1月中旬，阿巴索夫与彭长贵携带党的七大文件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著作回到迪化，2月3日和李泰玉等人举行会议，阿巴索夫汇报了在南京两次与董必武会见的情况，以及董必武传达的中共中央的意见后，决定将阿巴索夫等人在伊宁组织的人民革命党和迪化的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组成民主革命党，由阿巴索夫任主席，李泰玉、艾斯海提任副主席，其主要成员有赛福鼎、赛甫拉也夫、伊敏诺夫、安尼瓦尔·汗巴巴，以及陈锡华、罗志等人。民主革命党成立后，一方面建立和发展组织，另一方面用党的理论政策教育武装各民族的知识分子。1947年3月，民主革命党决定把领导机关迁往伊宁。阿巴索夫派李泰玉、陈锡华等人和彭长贵一同去伊宁，办汉文版的《民主报》。彭长贵携带的电台因功率小无法和延安联系，后改装了一部收发报机收听新华社的电讯稿，在《民主报》和三区的报刊上登载，使三区各族人民增进了对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政策的了解。

1947年8月省联合政府破裂后 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从迪化回到伊宁继续坚持斗争。苏联方面侦知民主革命党在伊犁的活动后，严厉批评了阿巴索夫，迫使民主革命党中央宣布自行解散，并号召其成员参加即将成立的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1948年8月1日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在伊宁成立，作为领导三区 and 全疆各族人民斗争的政治组织，推选阿合买提江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席。原民主革命党成员赛福鼎、艾斯海提、安尼瓦尔·汗巴巴等为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阿巴索夫则被排除在组织委员会之外，以示惩戒，后任新盟新闻情报处处长。这反映出苏联仍然严密控制三区领导层，不许任何人插手，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

¹ 徐玉圻、张克迅：《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208页。

² 徐玉圻、张克迅：《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209页。

3、三区革命汇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回到伊犁后的阿合买提江等人日益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对党的方针政策、对内地革命形势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把三区革命的前途逐渐同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联系起来。1949年1月26日，阿合买提江在关于当前形势发表的演讲中指出：“国内民主力量如取得胜利，自然会对我省民主力量产生影响。近年国内情况表明反动势力节节败退，民主力量蒸蒸日上。”¹ 4月8日，阿合买提江在引用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的内容以后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推行的民族政策是错误的，主张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因此，三区人民应对目前反对国民党的民主战争所导致的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予以高度关注。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到新疆今后的命运。”² 5月11日阿巴索夫在新盟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引用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关于民族政策的论述之后说，过去“我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没有顾及统治民族中有被统治与被压迫人民，因而未分清统治民族内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所以产生了一种将国民党反动派与整个汉族看成一体的错误，以至到现在少数不良分子还对汉族采取敌视的态度，甚至强占汉人的财产，拒还债务，以至威胁生命，不顾汉族在法律上的权利。”检讨并纠正过去在民族关系上所犯的错误。报告还深刻地指出：“事实证明，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仅在其特点、方向及其任务方面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一致，而且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或中国民族问题彻底和正确解决的角度上来看，也是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中国人民进行的解放战争是为了解放中国境内的一切民族。事实上，也唯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才能彻底地、正确地解决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其中包括民族压迫的问题。”报告最后说：“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唯有在中国人民解放运动获得最后胜利时，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新疆的民族问题才能够得到彻底和正确的解决，新疆人民的前途才是光明的。”³ 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的这些正确的认识，为后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准备了思想条件。

随着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各族人民的企盼下迅速发展，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三区革命的关注度也日益提升，并且十分清楚三区问题的症结在苏联。1949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人会晤。据米高扬后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中说：“关于新疆，这个问题也同样引人注意。毛泽东怀疑我们打新疆的主意。毛泽东说，新疆伊犁地区在进行独立运动，这运动不受乌鲁木齐政府支配，伊犁也有共产党。他说，1945年他在重庆同白崇禧会面时，白告诉过他，说伊犁的地方起义者拥有苏制的高射炮、坦克和飞机。”报告中说：“我（即米高扬）确切地告诉毛泽东说，我们不主张新疆各族人民的独立运动，况且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我们认为新疆是也应该是在中国的版图之内。”⁴ 这是在中苏两党高层之间第一次就新疆三区革命交换意见，表明态度。

米高扬回国后，人民解放战争继续胜利发展。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4月23日，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解放军各路大军迅速向全国各地进军。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于5月份攻占西安后，正向兰州、西宁等地挺进。1949年6-8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在6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美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以使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斯大林还说：“你们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马步芳的部队主要是骑兵，在有大炮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将其摧毁。如果你们愿意

¹ 徐玉圻、张克迅：《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289页。

² 徐玉圻、张克迅：《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292页。

³ 徐玉圻、张克迅：《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295页。

⁴ （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9页。

的话，我们可以提供 40 架歼击机。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¹ 刘少奇将斯大林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后，毛泽东回电：“同意尽快占领新疆并建议代表团具体地解决提供苏联空军支援和空运部队的问题。”² 7 月 11 日，苏联得知美国正在策动西北五马撤入新疆，企图在新疆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的消息后，即向刘少奇建议：“新疆有三区革命力量与国民党对抗，中共可先派人去联络，再命人民解放军挺进新疆，可提前解放新疆。”³ 7 月 25 日，刘少奇将毛泽东的回电转交斯大林。电报称：“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并通报了我军解放大西北的战况和计划后说：“如果是这样，我军就有可能在今冬占领迪化。”⁴ 毛泽东、刘少奇和斯大林之间就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以及直接和三区建立联系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1949 年 8 月 14 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代表团的政治秘书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带 3 名工作人员和一部电台从莫斯科经阿拉木图到达伊宁。经苏联驻伊宁领事尼波·阿里斯托夫安排，与三区领导人会晤。8 月 17 日，邓力群正式会见了阿合买提江、伊斯哈拜克以及阿巴索夫等人。三区领导人表示，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中，关心处在偏僻地区的新疆各族人民，并派人来联系，感到兴奋，将提供一切材料，安排各方面负责人向邓力群汇报情况。

8 月 18 日，毛泽东以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主任的名义给阿合买提江发出正式邀请信，邀请三区方面派代表参加即将在北平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信中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⁵ 对三区革命予以高度的评价。8 月 20 日，阿合买提江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热忱地说：“我们认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就是全世界和全新疆人民的胜利，所以我们以最高的热情来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⁶ 不幸的是阿合买提江等人在乘苏联的飞机飞往北平途中，8 月 27 日在苏联伊尔库茨克地区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11 月 22 日，毛泽东主席在致新盟中央的唁电中表示了深沉的哀悼后指出：“阿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生前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最后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而牺牲，值得全中国人民的永远纪念。”⁷

毛泽东对三区革命的评价为我们研究新疆三区革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三区革命初期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虽有公开分裂祖国和反汉排汉的严重错误，但其本质和主流是反对盛世才和国民政府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争取民族平等和解放。这在总的方面配合了我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给新疆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并牵制了在新疆的国民党军队不能东调入关，这对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有力的支援。特别是最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汇入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配合和支援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新疆。新疆解放后，为我党提供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这批少数民族干部中的绝大多数在我党的培养和教育下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为新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¹（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等译：《斯大林与中国》，第 100 页。

²（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等译：《斯大林与中国》，第 119 页。

³ 徐玉圻、张克迅：《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302 页。

⁴（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等译：《斯大林与中国》，第 121-122 页。

⁵ 徐玉圻、杜瀚：《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第 1-2 页。

⁶ 徐玉圻、杜瀚：《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第 13 页。

⁷ 徐玉圻、杜瀚：《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第 3 页。

【论 文】

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¹

徐玉圻、顿时春²

1944 年秋，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专区爆发的三区革命，是新疆少数民族反对盛世才、国民党政府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武装斗争，是新疆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三区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在这场斗争中苏联（指原苏联，为叙述方便，这里仍称苏联）所起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从革命的酝酿、组织、发动武装斗争，三区方面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和平谈判，成立省联合政府，到三区革命汇入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整个过程都与苏联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与我国新疆地区的关系 及其对新疆地区的基本政策

我国新疆地区与苏联中亚地区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接壤。新疆境内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兹别克等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与以上苏联各中亚共和国的民族基本相同，而且双方群众还有不少亲戚关系，这一切为双方频繁的人员和经济往来等等提供了方便条件。

当时，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为打破资本主义世界的敌视和封锁，摆脱孤立的困境，极希望与周边国家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如果周边国家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出现亲苏的国家政权或地方政权，对苏联都是十分有利的。我国新疆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新疆地区如果出现一个亲苏政权，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苏均有莫大好处。至于这个政权掌握在哪个民族或哪个党派手里，对苏联来说，不是主要的，关键是要亲苏，受他的控制、听他的指挥。因此，苏联总是积极扶植和支持新疆的亲苏势力，打击、反对新疆的反苏势力，支持建立受他影响和控制的亲苏政权，以便将新疆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苏联一直千方百计欲实现的目标。

1911 年辛亥革命后新疆的政治形势为苏联势力进入新疆提供了可能。杨增新、金树仁时期，由于内地军阀混战和中央政权的削弱，新疆省政府与中国中央政府若即若离，关系松懈，与内地往来较少。相反，为获得各族人民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新疆加强了与苏联的经济往来。为维持和稳定新疆的政治局面，新疆当局也不敢与苏联交恶，深深懂得一旦与苏联关系紧张，赖以生存的政权就不能稳定，就有被推翻的危险，所以，都竭力与苏联保持互惠互利的关系。

1920 年前后，苏联红军进入新疆，帮助杨增新消灭了流窜到新疆的白俄军队后，即退回本国。在中苏两国还未正式建交前，杨增新就于 1920 年 5 月与苏联签订了临时商约，后新疆苏联又互设领事馆。1927 年 9 月，因发生中东路事件，中苏断交，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金树仁召回新疆驻苏五领事，金力陈新疆情况特殊，仍维持原状。1931 年 10 月，金树仁还背着南京政府与苏联签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

1933 年迪化发生四·一二政变，金树仁仓惶出逃，盛世才乘机攫取政权。当时张培元、马仲英等军阀拥兵自持，尧乐博斯、和加尼亚孜也割据一方，伺机而动，政局极不稳定。苏联从扶持亲苏势力出发，看好盛世才，并答应予以支持。在盛世才危急存亡关头，苏联出兵助盛，使盛世

¹ 本文刊载于《西域研究》1999 年第 3 期，第 42-49 页。

² 作者单位：中共新疆党史委员会。

才得以铲除异己，巩固自己的统治。随后，苏联又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予以援助，派遣一批专家、技术人员至新，并开进一个团（即“红八团”，其实相当于一个旅的兵力）驻守在哈密，既为维持欧亚交通线的畅通，也为替盛世才防守东大门，阻止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势力入新，同时也对盛世才起到威慑和控制作用。苏方还帮助盛世才制定了比较进步的“六大政策”，恢复和发展了新疆的经济和文化事业，暂时稳定了新疆的政局，促使盛世才掌握的新疆地方政权具有反帝亲苏性质。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军以“闪电式”突袭战略，攻占了苏联大片国土，兵临莫斯科城下，战局对苏联十分不利。盛世才错误地认为，苏联已靠不住了。国内，各抗日根据地在日伪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的反共磨擦中面临严重困难，抗日战争形势非常严峻。于是从1942年开始，盛世才公开投靠国民党，明目张胆地反苏反共。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全部逮捕入狱，并秘密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同时撕毁与苏联签订的各项协议，强迫苏联撤走驻哈密的“红八团”及地质考察团、顾问、教官、专家、医生等苏方人员，苏联与新疆的贸易往来也随之中断。苏联在新疆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失。此消彼长，国民党势力随即进入新疆，并在军事上、政治上逐渐控制新疆。美国也趁机插手新疆，在迪化设立领事馆，并企图在伊犁建立反苏基地，竭力使其势力向新疆渗透。苏联当然不能忍受失去在新疆的既得利益，更不允许在自己边境有一个反苏基地存在；况且当时正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处于艰难时期，如果在苏联边境帝国主义再行捣乱，后果将不堪设想。因而，苏联迅速转向利用和支持新疆各少数民族对反动统治者的严重不满，积极策划新疆少数民族反对盛世才、国民党民族压迫的斗争。

苏联选择位于新疆西北部的伊、塔、阿三区，积极支持、秘密策划少数民族起来武装暴动。

1、加强宣传，制造舆论。据说开始曾试图利用马列主义发动群众，但收效甚微。因为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几乎都信仰伊斯兰等宗教，宗教意识浓厚，不容易接受无神论的马列主义；上层人物如大地主、大商人、大牧主、部落头目从自身利益出发，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尤其是十月革命和农业集体化时由苏联逃到新疆的上层人物对此更反感。因此，苏联转而利用宗教和民族主义旗号进行宣传鼓动。从1943年起，苏联在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成立“支援东方委员会”，出版《哈萨克人民》和《东方真理》等报刊，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新疆的阴谋，揭露盛世才、国民党实行民族压迫的罪行，宣传乌斯满等人的反抗斗争，增强群众的反抗意识（其中有许多篡改、歪曲新疆历史，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损害我国统一的言论）。将印刷好的传单、报刊等传入新疆，并利用宗教活动、集市、秘密会议等场合，广泛宣传、动员，对少数民族上层和一般平民百姓影响力极大。

2、建立秘密组织，培训骨干。三区革命爆发前，苏联在三区的工作人员在驻伊宁领事巴申的领导下，分别在封建、宗教上层、知识青年、国民党部队中的少数民族官兵和十月革命后逃来新疆的白俄等人员中进行工作，建立秘密组织。如伊宁的“解放组织”、塔城的“战斗小组”等。这些组织成立后，即在群众中开展反对盛世才、国民党统治的宣传、组织活动。有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员在苏联留过学或受过训练，他们在苏联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和军事知识，回国后就起到组织动员群众的作用。同时，还组织本地少数民族人员秘密越境去苏受训，然后，给予武器，潜返伊犁参加武装暴动。1944年6月，塔城的哈斯木阿洪·司马义也夫等人越境去苏，在苏联境内建立了依密勒指挥部，以边境贸易为掩护，指挥塔城地区的反抗活动。

3、在军事上，支援武器装备，派遣军事顾问，制定作战计划等，在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之前，进行小规模游击战，以造声势。三区游击活动开始时，使用的武器除少数从国民党军警手中缴获的外，多数为苏联所支援。1944年6月，苏联派遣阿热甫拜、哈森等13名军事顾问，取道蒙古国到青河县布尔根一带的阿山游击队营地，参与领导和指挥阿山游击队的活动。8月初，巩哈县（今尼勒克县）的哈萨克族牧民艾克拜尔、色衣提等人去苏用马匹换取枪支、弹药，在中苏边境遇到1943年夏去苏联阿拉木图等地接受苏联军事、政治训练结束后被派回国的原巩哈县土

产公司副经理帕提赫·莫斯里莫夫等人，艾克拜尔和帕提赫·莫斯里莫夫会合后即携带枪支弹药回巩哈县，积极发动、组织群众，建立游击队，很快就爆发了巩哈暴动。

二、全力支持三区各族群众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斗争

三区革命从正式爆发到把国民党势力赶出三区、以玛纳斯河为界与国民党势力形成对峙局面，这一重大胜利无疑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取得的。没有苏联提供大量武器装备、苏联顾问的部署、指挥甚至派遣部队直接参战，三区军事斗争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1944年11月7日，伊宁暴动爆发，苏联军官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直接组织和指挥攻占伊宁县城。11月12日，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并把军事指挥部改为“临时政府”游击队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在各地作战的所有武装力量，任命阿列克山德洛夫为游击队总司令。1945年1月7日，“临时政府”委员会通过6号决议，决定成立军事厅，并责成阿列克山德洛夫负责制定军事厅的组建方案及各项军事制度草案。1月12日“临时政府”委员会通过6号决议，批准成立军事厅，任命阿列克山德洛夫为厅长，还决定组建正规军队，实行军衔制，军队编制皆仿苏军。1月27日，鉴于本月中旬，在国民党援军部攻入伊宁北部的危急情况下，身为临时政府军事厅长的阿列克山德洛夫却乘坐满载物品的汽车准备逃回苏联，临时政府委员会通过13号决议，决定免去阿列克山德洛夫军事厅厅长职务，同月底，又免去他游击队总司令职务，由伊万·雅科夫列维奇·颇里诺夫接任。颇里诺夫系俄罗斯族，白俄军官，俄国十月革命时来新疆，1938年被苏联引渡回国。三区革命爆发后，从苏联奉命到伊犁，先后指挥了艾林巴克、乌苏等战役。3月底，颇里诺夫又被任命为即将组建的三区革命民族军总指挥。

11月下旬，以符拉基米尔·柯孜洛夫中将为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和以符拉基米尔·斯特潘诺维奇为首的政府顾问团（其办公地点代号为“一号房子”和“二号房子”）到伊宁。军事顾问团负责军事指挥，政府顾问团负责帮助组建临时政府各机构，并安排苏方人员充任政府各厅副厅长，掌管实权。1945年4月8日，三区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民族军，下设8个团，除颇里诺夫任总指挥外，各团副职均有苏联人。这两个顾问团对军事斗争的胜利和三区各项工作的开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苏联还多次在关键时刻派部队直接参战。1944年11月6日深夜，阿巴索夫和苏联派来的彼·罗·阿列克山德洛夫率一支武装人员，从霍城边境进入伊宁市区，参加战斗。11月16日，伊斯哈克伯克和苏联军官亚历山大（化名斯坎德尔，装扮成塔塔尔族）率一营骑兵（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苏联军人，主要是塔塔尔、柯尔克孜、哈萨克族），越界到伊宁参加战斗。

国民党军盘踞的飞机场、鬼王庙、空军教导队等三个据点久攻不下，苏联军事顾问团决定先攻打霍城、惠远、绥定以打通边境到伊犁一线，由顾问团负责人柯孜洛夫中将亲自任总指挥。1945年1月20日左右，从国境到伊宁一线打通，苏联军火到来。随后，即集中力量向国民党军据守的飞机场等据点发动总攻，彻底肃清了国民党在伊宁的残余势力。

三区革命初期苏联除支援大量的武器装备外，凡重要的战役、战斗均根据战局的需要派遣苏军参战。如攻打伊宁飞机场、绥定、惠远时，苏联军队化装成民族军参加战斗，或者是天黑来参加战斗，天亮前撤走。攻打乌苏、精河时，不但出动了步兵，而且出动炮兵、装甲兵参加战斗。这些部队都装扮成三区民族军。除上述参战部队外，在惠远攻下后，苏联派近一师的正规军驻扎在惠远、绥定一带，根据战局的需要随时可出动作战。

尽管三区革命初期苏联在政治上、军事上全力支持三区各族人民反对盛世才、国民党的斗争，但始终没有外交上公开承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可见，苏联在政治上还是留有余地的。

三、促成三区与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以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宣告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局势的主流趋向缓和，和平、民主、民族解放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饱经战争苦难的各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元气，重建家园。此时，如果再进行战争，即使是局部地区的战争，也是违反时代潮流，很不得人心的。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遭受巨大损失，付出重大代价，更需要休养生息，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战后国际格局已由雅尔塔会议作出安排，美苏两国各有其势力范围，东亚属于美国势力范围，如果苏联继续在新疆支持三区方面向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就难以避免美苏矛盾的激化，给苏联带来一些麻烦。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向国民党政府承诺如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独立，则苏联不干涉中国新疆地区的内部事务。如苏联继续支持三区民族军扩大军事行动，岂不有失国际信誉。所以，当三区革命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打击，使三区政权站稳脚跟后，在确保对三区的控制权、为三区各族人民争得一定的民主权利、新疆国民党地方政府能实行亲苏政策的前提下，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对苏联较为有利。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苏联对三区革命的政策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从支持三区向国民党发动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政权，转向支持三区与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

1945年9月13日，张治中奉蒋介石之命率国民党中央政府有关人员自重庆飞抵迪化“考察事变的真实情况，提出报告，作为解决问题的参考”¹。第二天，张治中即与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也夫见面，征询其对解决新疆问题的意见。叶表示，伊宁事变属新疆内部事件，中苏双方在莫斯科订约时，苏联曾正式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苏联对新疆无领土野心，并说现时最好设法和平解决。张治中问叶谢也夫，是否愿意代为疏通阻塞和平解决的道路。叶说，他个人极愿帮助，但此事须由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才为有效。张治中当天即电告蒋介石，建议至电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政府提出请苏联方面出来调停。

苏联方面反映非常迅速。9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德洛夫奉苏联政府之命告知国民政府外交部：近有穆斯林数人，自称新疆暴动人民代表，向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暗示，希望苏联出面调停彼等与中国当局所发生的冲突，并声称：暴动人民原无意脱离中国，其宗旨在使回民（当时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作者）在新疆多数地方达到自治之目的。彼德洛夫表示：苏联政府因关心苏联与新疆接壤地区之安宁与秩序，如中国政府愿意，则准备委派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之协助，以便调停新疆已造成之局势。

国民政府外交部经请示蒋介石后，即答复：对苏联政府愿意协助甚为感谢，并请苏联驻伊宁领事馆通知“事变分子”派代表到迪化晋谒张治中部长，商洽和平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英国伦敦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就“新疆伊宁事件”事态的日益扩大进行了磋商，莫洛托夫表示：此事件为暂时现象，不久可平息。

通过苏联方面的斡旋和促进，三区方面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双方同意进行和平谈判。1945年10月12日下午，三区方面代表热合木江·沙比尔、阿不都海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哈斯木3人抵迪化，与国民党中央政府代表张治中等进行和平谈判。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苏联始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苏联确实做了许多工作，起到了“调解人”的作用。谈判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在公开或私下场合不便说、说不通、争论不休或根本不能接受的提案，一般都经苏方斡旋、调解做疏通工作，使一方做些让步，另一方也做些妥协，然后达成基本共识。至于对方根本无法接受的提案，在几经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或者撤销或者保留意见，但不再向对方提出。如三区代表初到迪化时提他们是代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来和中国政府代表进行谈判的。张治中得知这一情况

¹ 《张治中回忆录》第41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

后，当即与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也夫谈话，请他转告三区代表放弃这个要求，叶答应转达，经叶劝告三区代表未再坚持原来的态度，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均用“中央政府代表”和“人民代表”的名义。又如，三区代表曾提出“取消政治警察，各地警察由当地人民充任”。这条提案国民党政府方面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双方经过谈判，加上苏联新任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利也夫的疏解，三区代表不再坚持写入和平条款附文中，只作谈话纪录备案。在和谈过程中，双方代表分别会见苏方或苏方主动与谈判代表联系达19次之多。通过苏方斡旋的问题有：三区代表到达迪化的时间和路线；双方谈判代表身份的确定；对张治中提出的《中央对解决新疆局部事变之提示案》的争论；民族军改编；省联合政府委员与省主席的产生等。特别是后两个问题，双方争论非常激烈，多次形成僵局，正是通过苏方斡旋以及其他因素，才逐渐达成共识。

其次，在谈判过程中苏方支持、扶植三区的爱国进步力量，使之逐渐在三区领导核心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坚决遏制反对和平谈判的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阿合买提江以其在谈判中的才干成为实际上的首席代表，并被提名为即将组建的省联合政府的副主席；而作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主席的艾力汗·吐烈仅被提名为省联合政府的委员，而且很快被秘密送回苏联，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苏联的这一举措无疑为三区扫清了与国民党政府顺利进行和谈的障碍，而且还为三区革命领导权的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以阿合买提江为代表的爱国进步力量陆续进入三区革命的权力中心，逐渐掌握了领导权，才使纠正三区革命初期发生的严重错误，并使三区革命汇入全中国的革命洪流成为可能。

可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苏联对三区的政策有很大变化，即从支持三区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成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转变为支持三区与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取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旗号，承诺不干预新疆地区的内部事务。这是对新疆爱国进步力量的鼓舞和支持，对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是沉重的打击。

四、促进三区接受中共领导

三区革命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声援和支持，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曾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和镇压三区革命的罪恶行径。各解放区的报纸也曾多次报导三区革命的情况并表示热情支持。三区领导人阿巴索夫曾利用去南京参加伪国大的机会，秘密拜访了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负责人董必武，要求中共派干部到三区参加领导工作，但由于当时情况复杂，新疆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仅派译电员随阿巴索夫去伊宁，不料带去的电台功率太小未能接通与延安党中央的联系。解放前新疆又没有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所以三区革命一直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

阿巴索夫自南京返新后，即遵照董必武谈话精神，于1947年2月秘密成立了民主革命党。该党团结了一批爱国进步分子，凝聚了新疆各民族中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张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骨干力量。可是，民主革命党的成立及活动情况被苏联领事馆知悉后，竟被解散，重新组建了一个经苏方同意的群众性的政治组织“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此举不管苏方出于何种考虑，但有一点是比较明显的，即未经苏方同意建立组织是不能容许的。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三区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报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介绍解放区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表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著作等的数量日益增加。从宣传报导和三区领导人言论中，可以看出三区革命领导人实际上已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代表着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三区革命只是中国一个地区性的民族解放运动，它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形势下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三区革命的前途向何处去，三区内部有过激烈的争论，一小撮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幻想在苏联的支持下从中国分离出去，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则主张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并像苏联那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及其他各项政策愈来愈深入人心，拥护祖国统一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进步力量日益壮大。此时，苏联鉴于国际和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已愈加明确地表示不支持三区独立，不干涉新疆地区的内部事务。1948年10月，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利也夫回国述职从莫斯科返回迪化后在会见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时明确地说：“我绝不同情现在的泛突厥主义者脱离中国的运动，任何国家的少数民族绝不能离开其祖国而获得光明的出路，此种脱离祖国的运动，对少数民族只有害处；但国家对少数民族应采取合理的政策，使其与国家联为不可分离之一体”。¹

苏联总领事的谈话，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苏联政府的意见。可见，此时此刻苏联已非常坚定地表明“不同情”、不支持民族分裂主义的分裂活动，而且指出了分裂对少数民族有害无益，只有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少数民族才有“光明出路”。

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苏联访问，苏方主动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加速解放新疆，解放新疆时，三区革命的力量可以配合，从军事上牵制国民党势力。于是，党中央决定派遣当时在莫斯科的邓力群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赴伊宁与三区革命方面联络。邓力群到伊后，先与苏联驻伊宁领事联系，经苏领事安排，与三区领导人会晤，受到三区方面的热烈欢迎，三区领导人表示“服从中共中央的一切指示和决定”。从此，三区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汇入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

总之，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和压迫，支持世界各国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苏联对中国革命也给予大力支持，与苏联国界相连的我国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解放运动对苏联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而苏联更为关注，一方面它积极支持少数民族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在三区范围内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这对中国革命包括三区革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它又容许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者打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旗号，搞分裂、独立，反汉、排汉，破坏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这对中国革命包括三区革命又是有害的。三区革命的发生、发展没有苏联的支持是不可设想的；三区革命初期发生的严重错误即搞分裂、独立、反汉、排汉、破坏民族关系，苏联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苏联对三区革命中、后期的政策与初期相比，有所调整 and 变化，并支持三区的爱国进步力量纠正三区革命初期的严重错误，这是可取的。但为了在新疆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亲苏政权，他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竟利用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这是不可取的。如果苏联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它就应该以马列主义民族观来指导运动，就不会让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上台掌权，并让其搞了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破坏革命运动的勾当。同时，应该及早促进三区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中国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按照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武装三区革命方面的思想，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使其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密切配合全国的革命斗争，防止或减少在国家统一和民族问题等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成为具有完整意义的、彻底的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¹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28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

【论 文】

国民党政府对新疆三区革命的政策¹

黄建华²

摘要：国民党政府对新疆三区革命的政策随着国内外政治局势的演变在不断变化、调整，即分别采取了以军事手法抵制三区革命发展的政策、试图用《和平条款》统一三区的政策、与三区武装对峙以待时局的变化政策、向三区让步以维持新疆现状的政策。

关键词：国民党政府；三区革命；政策

三区革命是指 1944 年 11 月 7 日在新疆爆发的旨在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新疆少数民族革命，它是苏联帮助发动并得到苏联的支持的。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角度对新疆三区革命进行研究，笔者拟根据广泛搜集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国民党政府在不同时期对新疆三区革命所采取的政策进行专门探讨。

一、以军事手法抵制三区革命的发展（1944.11-1945.9）

三区革命是由苏联驻新疆伊宁领事馆帮助成立的“伊宁解放组织”精心策划、组织的。该组织首先策动巩哈（今尼勒克）游击队在距伊宁约 100 公里的巩哈县发动牧民暴动，吸引伊宁国民党军队 1600 余人前往镇压，致使伊宁城防空虚，仅剩 1500 多名驻军分散于各孤立据点。“伊宁解放组织”根据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建议，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伊宁举行暴动。参加暴动的人员有在苏联受过训练的游击队员及本地群众，苏军也入境参加作战。³ 11 月 14 日，暴动者占领伊宁市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军退守市东北部的艾林巴克一带。

蒋介石对伊宁革命所作的第一个反应即武力镇压，他指示坐镇迪化的朱绍良，“尽力”向伊宁“集中兵力”，“期早救平”。^[1]

朱绍良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组织五路援军增援伊宁。但此时察觉到苏联背后支持伊犁革命的蒋介石，开始意识到新疆问题的严重性，他指示朱绍良已集中于伊宁附近兵力积极进攻，“以期恢复伊宁、绥定（今霍城县之一部——引者）”；不得已，“则应在伊宁竭力对峙，作持久之计”。未调动部队巩固迪化至玉门公路的防务，确保南北疆各要点，防止“事变”地区扩大。迪化城和新疆各飞机场，从速构筑防御工事，“务使勿失为要”。^[2]

¹ 本文刊载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4 期，第 68-72 页。

²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³ 关于苏联派军参战的事实，有很多资料可以证实。当时指挥艾林巴克守军作战的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李铁军说：“查‘匪’中班长以上指挥官及其特种部队技术人员，均为苏联所派遣，敌我主力决战之地点，经屡次发现有苏联军队及极整齐精锐之骑兵参加。”（李铁军 1945 年 1 月 30 日致吴忠信函 [A]. 吴忠信，主新日记（未刊复印件）[Z]. 1945-02-06，见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藏）1949 年 8 月进驻伊宁的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撰文说：“在 1944 年关键性的一次战役中，国民党一个师的主力在伊犁附近被消灭，实际上是苏联方面支持、协助暴动起义的群众干的，缴获的武器也全武装了民族军。”（邓力群，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中苏关系之一页 [J]. 近代史研究，1989，（5））1947 年至 1949 年长驻伊宁的中共译电员彭国安也说：“伊犁的局面确实是靠苏联军队打出来的。”（彭国安同志 1979 年 3 月 4 日谈三区情况 [A]. 新疆民族研究所近代史室编，新疆革命史参考资料访问材料汇编（二）（1981 年打印本）[Z].）当时苏联为掩饰派军参战真相，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 1944 年 11 月 12 日广播称：苏联 10 月间有 5000 军人叛变，据传系逃往新疆。苏联驻迪化商务总办事处秘书列库得列亚山德川也对外界谈称：苏当局悬赏 20 万俄币侦察叛军下落。（总裁民国 33 年亥元侍奏电 [A]. 吴忠信，主新日记 [Z]. 1944-12-22）关于苏军入新参加作战的细节，参见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J]. 近代史研究，1999，（3）。

增援艾林巴克的五路军队有三路因天山达坂冰雪塞途无法行动,另外两路也因遭到暴动群众与苏联军队的阻止而失败。蒋介石“救平”伊犁无望,便在伊宁取“竭力对峙”的“持久之计”。12月31日,朱绍良乘空军运输机飞往伊宁上空,代表蒋介石慰勉守军。^[3](P. 36) 1945年1月8日,蒋介石亲自训示艾林巴克官兵,“以超越斯大林格勒之精神坚守到底”。^[4]暴动群众和苏军用高射机枪封锁伊宁上空,切断国民党的空中补给线;组织猛烈炮火轰击艾林巴克据点,“常日以数千发计”。^[4]守军弹绝粮尽,“持久之计”已不能持久,1月29日蒋介石批准突围。^[5]残军在突围途中被歼。蒋介石对援军“怯懦无力”非常恼火,令朱绍良“应即将增援部队之高级主管长官自其军长至团营长止,皆应严惩不贷,尤以其师长与团长级撤职,即交军法审判,以为不力无勇者戒焉”。^[6]

伊犁失守后,蒋介石估计苏联策动新疆人民革命不会只限于伊犁一隅,而会向全疆推进。他在批准艾林巴克守军突围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如俄国不放弃插手新疆问题的政策,“则我只有待对倭战事结束后再求得总解决。但迪化、吐鲁番、焉耆、哈密必须固守,不能放弃,以为将来恢复全疆之根据也”。^[7](P. 400) 2月11日,他致函朱绍良具体贯彻这一战略意图:此时对新疆计划,只可保守重要据点勿失,以为它日恢复的基地。如果勉强维持全局,则必致全疆沦陷而不可收拾。南疆不必十分顾虑某国之侵扰,中正不担心其侵扰南疆。至万不得已时,北疆方面只据守极少数据点,部署有守城决心的精锐部队,给予极优待遇,人数以可估计空运粮弹之数量而定,其他多数兵力,抽至后方以固根本。精河以西部队,余务必妥速撤至精河、乌苏一带布防。此时当顾虑春季南北疆全部之骚乱,不能不积极准备,然亦不必以此为虑,只要有定策与定力,而不作力所不能及之计划则得矣。盖必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备多力分,只能一事无成。^[6]

朱绍良按照蒋介石的新疆军事防御计划,迅速在北疆地区进行新的防御性部署:将精河以西各山隘放弃,驻军后撤至精河设防^[8],作为拱卫迪化的外围屏障;将阿山区富蕴、乌河一带驻军撤退,借以增强迪化外围的奇台、呼图壁、绥来(今玛纳斯)、乌苏的力量^[9];阿山(今阿勒泰)仅留少数兵力分守承化(今阿勒泰市)、福海,将来用空运方法对此两地进行军事补给。南疆兵力部署基本未变,驻守南疆部队多属盛世才旧部,武器装备陈旧,战斗力较弱。

与此同时,蒋介石开始在新疆积极备战。当时国民党在新疆驻有10个师^[10],因部队编制员额不足^[11],总兵力不足4万人。^[12]蒋介石调青海马步芳的两师骑兵入新¹,以增强新疆机动作战的能力。新疆与内地相隔大漠,军事补给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导因素,蒋介石两次派交通部长俞飞鹏飞临迪化,考察新疆交通、军事补给事宜。俞飞鹏拨给新疆汽车255辆,呈请蒋介石设立新疆供应处²,统筹管理新疆各不同系统部队的后勤供给。新疆与内地只有一条兰(州)迪(化)公路相通,一旦此路有失,新疆将完全失去内地依托而陷入绝地。蒋介石下令修筑南疆公路,一条自安西经羌(今若羌)至焉耆线,一条自安西经玉门至吐鲁番线,限期1945年8月完成³。北疆军事形势相对严峻,迪化一旦有失或变成围城,新疆政治中心势必由迪化向南疆转移,蒋介石令在省府之下设立南疆行署⁴,以备迪化政治中枢陷于瘫痪时,南疆行署自然过渡为新疆政治

¹ 蒋介石1945年1月即决定调马步芳的两师骑兵入新,但马步芳借机向蒋介石要装备、开拔费等,迟至9月以后马的部队才陆续开进新疆。(吴忠信,主新日记[Z],1945-01-25)

² 俞飞鹏、朱绍良、吴忠信1945年1月联名呈请蒋介石在新疆设立供应处,蒋介石予以批准。但各有关部门就供应处是隶属战运局还是后勤部相互推诿,后由蒋介石裁定划归后勤部管理。6月,新疆供应处成立。(俞飞鹏,等,为拟请在迪化设立运输总处以适应军事需要[A],吴忠信,主新日记[Z],1945-01-19)

³ 南疆公路后只修筑从安西经若羌至焉耆段,毛路于1946年1月全线抢通。(吴忠信,主新日记[Z],1945-05-02)

⁴ 1945年4月,蒋介石决定设立南疆行署,设置地点与主任人选也均先后选定。但在具体实施时,吴忠信向蒋介石提出将新疆划为四省的建议,分省之议虽被国民党中常委会议否决,但设置南疆行署的时间被延迟。后因中央政府与三区代表谈判奠定了新疆和平局面,已无在各区专员公署之上再叠床架屋设置南疆行署之必要,南疆行署之设遂作罢论。(蒋介石致吴忠信代电(1945-04-22)[A],吴忠信,主新日记[Z],1945-06-08)

中心。蒋介石还曾考虑适应未来战争需要在新疆实行军政一体化，由吴忠信兼理军政两职。¹ 伊犁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时间比蒋介石估计得迟，从 1945 年 7 月起在南北疆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全线攻击，重点放在北疆地区。蒋介石在北疆的设防城市塔城首先弃守——塔城专员平戎率官兵不战而逃。塔城一失，国民党军心动摇，新疆军事指挥层意见分歧：有人主张撤精河驻军巩固乌苏，有人主张先撤阿山驻军，也有人主张战败再撤。蒋介石令朱绍良：“无论精河、阿山，皆须坚守，不得撤退，中央即可增援。”^[13] 同时又手令吴忠信：“地方各级文武官长守土有责，如有官长擅自撤退不尽职守者，应依律就地处决，并严令各级官长抱定誓与城共存亡之决心，以重职责而保国土为要。”^[13]

塔城一失，国民党设防的其它外围城镇军事据点也相继被攻克，双方战事主要向精河、乌苏等地集中。精河、乌苏是蒋介石精心设置的拱卫迪化的屏障，驻有 12000 多人的重兵，修筑有坚固的工事，志在必守。伊犁方面则志在必克，将主力投入到这一地区作战，“大炮及新式武器数量倍增”，“指挥官及射击手皆为俄人”^{[14] (P. 764)}，苏联还直接出动飞机（包括重轰炸机）扫射轰炸精河、乌苏守军²，国民党驻军“死伤甚众”^{[14] (PP. 762-763)}，有些阵地上的碉堡，因受炮击轰炸也“大半被毁”。^{[14] (P. 762)} 蒋介石初次获悉苏机轰炸乌苏消息，甚为“惊骇愤激”^{[14] (P. 762)}；继“依据理智研究”后，认为苏联破坏盟约，在东北将俄军占领的张家口、山海关、秦皇岛让给中共，在新疆又轰炸乌苏、精河，“是其必欲与我敌”，因此“东三省与新疆驻军之配备与运输，不能不从速筹备，以防万一”。^{[14] (PP. 762-763)} 但他随后又对苏联扩大新疆战事的动机作出新的判断：认为一是为了转移国民党对东北的注意力，以贻误他接收东北的时机；二是以新疆问题为口实，不履行交还东北之义务；三是威胁国民党政府，暗助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四是支持伊犁多占地盘，以造成既成事实满足其侵略新疆的野心。基于这一对苏联战略动机的分析，蒋介石决定全力注意接收东北问题，“新疆即使沦陷，只可暂时忍受，不能立即作积极之抵抗”。^{[14] (P. 764)} 因此蒋介石在 9 月 7 日、8 日乌苏、精河相继失守后，下令死守新疆政治中心——迪化。他催促正向新疆开进的两师青海骑兵加速行进，调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寄嶠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名义飞迪“襄助”军事，实乃由郭组织指挥保卫迪化战役；派张治中去新疆“振奋士气，安定人心”^{[15] (P. 418)}；安慰方寸大乱的新疆“军民主管”朱绍良、吴忠信“坚忍镇静，决无大事”^{[14] (P. 763)}；指示吴忠信“暂缓来渝”^[16] 汇报情况以免动摇人心；命令新疆各部队固守原地，“不可擅自移动”^[17]；反复告诫朱绍良、吴忠信转令各级军民长官，无论何人无令擅退，皆照临阵脱逃论罪^{[14] (P. 763)}；要张治中转达他对作战不力的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李铁军的“意旨”，“令其本成功成仁之精神，共抱与阵共存亡之决心，保卫迪化”。^[18] 蒋介石打算死守迪化，首先是出于战略考虑，迪化是新疆政治中心，若迪化有失，整个新疆面目全非；其次是战术考虑，即新疆守军多是步兵，在毫无遮掩的戈壁荒滩上机动性差，一旦离开构筑有防御工事的阵地，极易被对方骑兵部队所追杀，与其撤出阵地全军覆没，不如死守阵地尚有转机希望。³ 但当时迪化只有 6 营兵力，增援部队最快亦须旬日才能到达，“除非伊宁军队中止前进”，否则“迪化殊无把握确保”。^{[15] (P. 419)} 伊犁方面没向迪化发起攻击，蒋介石所要死守的战略要地这才化险为夷。

二、试图用《和平条款》统一三区（1945.10-1947.08）

¹ 蒋介石明确提出由吴忠信兼任新疆军政两职，只因吴忠信不愿带兵而作罢。（吴忠信，主新日记[Z]. 1945-05-30）

² 根据如下事实可断定飞机是苏联的：1. 飞机“两翼有紫红色徽星”；2. 国民党俘获的伊方人员称：苏联将有 48 架飞机，分批在河沿基地降落；3. 苏联“曾广播有骑兵两团，飞机 20 架叛变”。（战后中国（一）[M]. P. 762，吴忠信，主新日记[Z]. 1945-09-15）

³ 这层意思蒋介石在给陷入东西夹击绝境的精河守军的电报中讲明：“精河此时，只宜固守，不宜撤退，否则仍蹈伊犁突围之覆辙，希排除万难，以求最后五分钟。”在告诫朱绍良、吴忠信死守迪化时也讲到这一点：“精河部队不应擅自撤防，须知一退却，即全军在途中被歼，万无逃命之望。”（郭岐，黄沙碧血战新疆[M]. 台北：圣文书局 1986. P. 96）

早在 1944 年底，蒋介石就在寻求以外交途径解决新疆问题^[19]，但直到 1945 年 6、7 两月才相继传来斯大林对新疆没有领土要求及中国收复伊犁失地“为合法之愿望”的表示^[20]（P. 618），蒋介石感到收复伊犁有望，7 月中旬开始调整新疆的军事部署，令朱绍良“巩固坚守”阿山，并计划收复二台。¹ 蒋介石接着吩咐朱绍良：“据一般观察，在今年国历 10 月间伊犁可能收复，故一俟青海骑五军开入新疆，我人应准备规复伊犁事宜。”^[21]

按照蒋介石的设想，苏联既已表示不支持伊犁革命，那他武力收复伊犁就易如反掌。但事实上苏联不但继续支持伊犁革命，而且又将伊犁革命推向塔城、阿山区，这使蒋介石意识到武力收复“失地”难以实现。正当这时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递交中国外交部一个节略，表示伊犁暴动人民“无主张脱离中国之意”，但要求在伊犁、塔城、阿山、喀什各区实行“自治”。^[14]（PP. 765-766）蒋介石认为所谓“自治”即苏联制造傀儡，他已用外蒙古独立换取新疆等地的领土完整^[20]（PP. 593-594），当然不允许新疆再裂土“自治”。他派代表与三区进行和谈，目的是想在谈判桌上收复三区“失地”。

因此国民党政府在和谈中无论对伊方如何政治让步，但在三区主权问题上丝毫不能通融。按照双方签订的《和平条款》规定，三区要完全纳入新疆省府的管辖范围，惟一特殊之处即三区可保留 6 团军队（国军和保安部队各半）。但即使这 6 团部队，也并非完全独立于国民党军事系统之外，而是三区部队指挥官“应服从新疆省警备总司令及全省保安司令命令”；部队之待遇供应及将来之武器装备，由中央按照驻新国军与省保安部队规章与标准供给；部队各级军官“分期调送军官学校，补习其应受之军官教育”；部队训练，“应由政府派遣教练人员，协同训练”；三区范围内的“国境之守备，由中央担任边防之军队负责”。^[14]（PP. 771-773）但新疆联合省政府是在国共内战的硝烟中诞生的，全国的和平局面尚且不能维持，新疆一隅的和平局面又如何维持得了。

所以伊犁方面不免“担心”、“怀疑”，事实上也就“不肯放弃三区特殊化，不肯改编军队，不肯让国军开进三区，不肯让中央机关去行使职权”。^[15]（P. 535）其结果是新疆联合省政府在形式上成立，实际上双方联而不合，相互攻击。伊犁方面指责国民党不履行《和平条款》实行民主政治等，国民党方面则说三区搞特殊化。1947 年 8 月伊方为抗议麦斯武德任省主席将在迪化的伊方人员全部撤回，新疆联合省政府破裂，国民党政府指望通过《和平条款》统一三区的幻想也随之破灭。

三、与三区武装对峙以待时局变化（1947.08-1948.12）

国民党政府见依据《和平条款》难以统一三区²，开始加强新疆的军事力量³，对伊犁方面的态度也趋于强硬。1947 年 5 月国民党政府任命麦斯武德为新疆省主席⁴，并公开支持投降国民党

¹ 二台是奇台通阿山的交通咽喉，收复二台在于打通阿山的陆上军事补给线，以确保阿山。（吴忠信，主新日记 [Z]. 1945-07-17）

² 张治中认为伊犁方面缺乏和平诚意，1946 年 9、10 月间派西北行辕参谋长宋希濂，带着他们拟定的补充驻新部队兵员武器器材表去见蒋介石和陈诚。蒋介石对新疆要求加强军事力量的计划批交参谋总长陈诚“酌情办理”，陈诚亦认为“新疆问题不可能真正和平解决”，答应“国防部当在可能范围”内补充新疆所需兵员、武器、器材等。这些说明国民党政府高级决策层已经认识到难以用和平方式解决新疆问题。（宋希濂，鹰犬将军 [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PP.218—220）

³ 1946 年 10 月，国防部允许新疆先成立 4 个边卡大队，每大队约 500 人，担任边境守备，使正规部队集结整训以应事变；允许陆续拨给补充兵 1.5 万人；允许增派一个汽车团（约有载重汽车 300 辆）；允许补充军马 3000 匹；另外还补给一批武器器材弹药等。（宋希濂，鹰犬将军 [M]. PP. 218—220）

⁴ 麦斯武德等人反苏反伊犁革命，与三区方面领导人处于对立地位，国民党正是想“利用他们的政治立场与伊方对立的矛盾，希望在他们影响下，可以削弱三区革命的势力”，达到分化维吾尔族的目的。（宋希濂，鹰犬将军 [M]. P. 220）

的阿山区专员乌斯满¹。伊犁方面领导人拒绝出席省府会议以示抗议，苏联还策动蒙古挑起北塔山冲突向中国政府示威²。1947年6月5日开始的中蒙北塔山冲突，说明国民党政府与三区的关系进入高度紧张状态。8月伊犁方面人员撤出迪化，新疆联合省政府破裂，国民党与三区方面的军事对峙状态开始。新疆军事当局按照蒋介石援助乌斯满的指令^{[14] (P. 781)}，接济乌斯满大批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支持乌斯满以北塔山为基地反攻阿山³。乌斯满快速向阿山推进，从8月下旬至9月中旬先后占领阿山绝大部分地区。苏联支持伊犁方面进行反击，再次将乌斯满逐出阿山。国民党政府通过乌斯满部与三区的武力交锋，试探出苏联支持下的伊犁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尽管国民党内不断有人主张武力统一三区，但张治中首先坚决反对。张治中劝诫主战派说：苏联不愿在新疆发动一次战争，或支持三区发动战争，但战争若由国民党方面首先发动，苏联愿意三区整个垮台吗？阿合买提江对人讲：你们发动战争，也许能占领乌苏；就是占领了三区，但他们还能发动一个全疆暴动，以从事游击战。^[22]当对峙双方都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时，致使任何一方都不敢轻启战端，从而暂时避免了战争。

四、向三区让步以维持新疆现状（1948.12-1949.9）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其败象已显现出来。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政府惟恐三区发起军事攻击，便想改善双方关系以尽快结束军事对峙状态。改善双方关系的障碍有两个：一是新疆军警机关的非法行为问题^{[15] (P. 570)}；二是麦斯武德的任职问题。宋希濂是新疆警备总司令，他对新疆军警机关的非法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因此成为三区方面攻击的目标。张治中首先呈请蒋介石调宋希濂回内地带兵，由西北行辕副主任陶峙岳接替他的职务。第二步张治中设法撤换麦斯武德的省主席职务，为此他亲自到南京向蒋介石及有关方面解释撤换麦的理由，力荐与苏联有一定关系的包尔汉继任新疆省主席。蒋介石采纳张治中的建议，1948年底国民政府发布撤换麦斯武德的政令，同时任命包尔汉为新疆省主席。

1949年1月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后，放弃与三区武装对峙政策：新疆只留一个旅担任边疆防务，其余部队悉数调入关内参加内战。为“顾全疆局安定，保持驻新国军安全”，国民党政府决定答应与苏联进行中苏在新疆的贸易与经济合作谈判。已升任西北军政长官的马步芳⁴，更力促中苏谈判达成协议，以掩护他驻新疆骑兵部队撤往兰州固守其巢穴。但出乎国民党政府意料的是，陶峙岳考虑到新疆情况复杂，“如让军队调走，地域如此辽阔的地区形成中空，势必难以保持安定”，“再说部队入关无非是去参加内战”，又非他所情愿，便以种种借口拖延时间而不执行这项命令。^{[23] (PP. 86-87)}至于已经开始的中苏在新疆的贸易与经济合作谈判，由于实际主持谈判的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认为新疆局势稳定与中苏贸易谈判关系密切，没有执行国民党政府在兰州失陷国军退路已断形势下中止谈判的指令，与苏联草签了《苏联与新疆贸易协定》，只是该协定国民党政府未批准而已。

参考文献：

^[1] 总裁治未待机电 [A]. 吴忠信，主新日记 [Z]. 1944-11-18.

¹ 乌斯满本是伊犁方面任命的专员，因疑惧伊犁政府会将他清除出革命队伍而投降了国民党。国民党起初背着伊犁政府接济乌斯满，后来则发展到公开将阿山经费直接拨给乌斯满，并大量接济乌斯满生活用品。

² 北塔山冲突是蒙古打着领土之争的幌子挑起的事端。蒋介石认为“其原因乃为乌斯满反对俄国与伊宁，对方必欲予以根本消灭，不容其留驻该地而起”，然最大原因，尤在委派麦斯武德为新疆省主席后，大为阿合买提江所嫉恨，故出此间接示威的举动。（战后中国（一）[Z]. P. 781）

³ 因乌斯满此时已被三区民族军赶到北塔山。

⁴ 马步芳 1949 年 5 月代理西北军政长官，7 月升任西北军政长官。

- [2] 蒋介石致朱绍良、吴忠信函（1944-11-25）[A]. 吴忠信，主新日记[Z]. 1944-12-03.
- [3] 王云五，民国朱上将绍良年谱[M]. [台北]: 商务印书馆，1981.
- [4] 陆军新编第二军司令部代电（参战字第514号）[A]. 吴忠信，主新日记[Z]. 1945-02-06.
- [5] 侯声，伊宁突围经过（1945-03-06）[A]. 吴忠信，主新日记[Z]. 1945-03-08.
- [6] 蒋介石致朱绍良函（1945-02-11）[A]. 吴忠信，主新日记[Z]. 1945-02-13.
- [7] 蒋介石1945年1月29日日记[A].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8] 吴忠信，主新日记[Z]. 1945-02-20.
- [9] 吴忠信，主新日记[Z]. 1945-02-12.
- [10] 俞飞鹏，等. 为拟请在迪化设立运输总处以适应军事需要（1945-01-19）[A]. 吴忠信. 主新日记[Z]. 1945-01-19.
- [11] 吴忠信，主新日记[Z]. 1945-05-20.
- [12] 吴忠信，主新日记[Z]. 1945-09-01.
- [13] 吴忠信，主新日记[Z]. 1945-08-05.
- [14]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 战后中国（一）[Z]. [台北]: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印，1981.
- [15]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M].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 [16] 重庆委座齐侍参电[A]. 吴忠信，主新日记[Z]. 1945-09-09.
- [17] 重庆委座申阳已侍参电[A]，吴忠信，主新日记[Z]. 1945-09-08.
- [18] 张治中呈蒋介石电（1945-09-13）[A]. 吴忠信，主新日记[Z]. 1945-09-13.
- [19] 黄建华. 迪化和谈前有关新疆问题的对苏交涉[J]. 西北史地，1996，（1）.
- [20]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Z]. [台北]: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印，1981.
- [21] 吴忠信，主新日记[Z]. 1945-07-17.
- [22] 张治中，当前新疆问题和我们的根本看法与态度，（民国36年3月30日在行辕对驻迪党政军负责干部讲话）[A]. 张治中. 七十回忆录·附录[M].
- [23] 陶峙岳，陶峙岳自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论 文】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区村长选举¹

——主要基于和阗区的考察

黄建华²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维吾尔族聚居区实行的区村长选举制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区村长的选举在部分乡村实施，民选与上级政府委任并存；第二阶段虽未全面实施区村长选举制度，但对区村长的民选方式和程序开始有所规范；第三阶段全面推行民选区村长制度，并规定有统一的选举程序等。虽然维吾尔族聚居区的民选区村长制度还远称不上完善，但也是民主政治的进步。

杨增新、金树仁统治新疆时期，维吾尔族聚居区主要实行的是乡约制。盛世才执掌新疆政权后，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在来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帮助下，推行了许多民主、进步的政策，其中废除乡约制改行区村长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尽管共产党人的个人行为，最终难以敌过旧政权的势力，难以有所作为，但我们不能据此低估区村制的推行在维吾尔族聚居区乡村建设史上的重要意义。区村长选举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关于维吾尔族聚居区推行区村制的情况，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述，但关于区村长的选举情况，学术界知之甚少。笔者曾先后在和田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哈密地区、阿克苏地区、库尔勒市、哈密市、和田市等地档案馆查阅档案，并在和田地区档案馆集中发现了一批关于区村长选举的资料。虽然一般来讲维吾尔族聚居区各地推行区村制的进程大致相同，可毕竟没有更完整的资料予以说明，所以我们勾勒的民国时期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区村长选举情况，主要是基于对和阗区（今和田地区）的考察。

一、

盛世才在新疆推行区村制从 1937 年开始到 1942 年结束。根据陈芸、张皓《盛世才执政时期新疆区村制探析》一文的研究，盛世才在新疆推行区村制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工作从 1937 年开始至 1940 年底结束，区村制的推行是从厘定整顿县治开始的。^[2]

实际上早在金树仁统治新疆时期，就曾借推行南京国民政府新县制的政令以加强对新疆基层社会的控制。但因他在哈密农民暴动等问题上处理失当动摇了其在新疆的统治地位，不得不将新县制的改革范围局限到新疆一隅，县下设区的改革也有名无实不了了之。^[3]

盛世才进行新疆区村制改革，表面上看有在共产党人推动下实行民主政治的动因，但骨子里依然是加强对新疆乡村社会的控制以增强汲取乡村财富的能力。盛世才“厘定整顿县治”包括“改定县治”和“增设县治”两部分。“改定县治”主要是锡伯、索伦等民族的营旗制和蒙古族的蒙旗制改设县治；“增设县治”是新疆部分地方升格为设治局。1940 年李英奇总结第一期三年计划成绩时提到了“添设县治”工作。他说：“添设县治计有以下四处：一、焉耆区：和硕设治局、和靖县；二、伊犁区：昭苏设治局、巩哈设治局、河南设治局；三、塔城区：察汗托海设治局；四、喀什区：阿图什设治局、乌恰设治局。”^[4] 上述阿图什设治局、乌恰设治局就添设在维吾尔族聚居区内。

¹ 本文刊载于《西域研究》2014 年第 2 期。

²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

这一阶段县以下的行政机构设置没有统一标准，多是因应旧有的建置设立的。如河南设治局将锡伯族旧有 8 个牛录改设为 7 个直辖村，没有设区；和硕设治局改旧有的旗为区，改旧有的苏木为乡。在维吾尔族聚居区县以下基本改设乡约管辖地为区。库尔勒县 1940 年 5 月 10 日利用巴扎日召开农民大会，参加者为各机关法团、各大阿訇、各乡约、伊玛目及农牧民约 500 余人，“改定农村行政组织，划分四乡为五区，每区各推区长一人，共推总区长一人，并将每村之伊玛目推为兼充村长，又组织水利委员会。”^[5]此外，改乡约管辖地为区的县份还有叶城县^[6]、和阗县（今和田市）^[7]、皮山县^[8]、洛浦县^[9]。墨玉县将过去的乡约“改名区长”，“划区过多，区以下玉子巴什名称沿习未改。”^[10]

盛世才在推行区村制的同时，开始对区村干部进行培训。盛世才在省城开办的政治干部训练班乙班招收在职的年轻区、村干部，多数是农官、乡约，毕业后“其原充乡约农官者仍回原籍”^[11]。同时各行政区也开办有区长训练班，如 1939 年和阗行政区开办区长训练班。^[12]此外也有一些县（设治局）组织了村长、街长训练班。省城、行政区及各县开办的区村长训练班毕业生，开始担任区村长职务。如和阗县的日乎板尼牙孜，1939 年 9 月考入区长训练班，1940 年 1 月毕业，被委任为和阗县第九区区长；皮山县的达伍提，1939 年和阗行政区区长训练班毕业，同年担任皮山县第一区副区长，1940 年升充第一区区长。

总之，该阶段区村长的选举制度还没有完全确立。如墨玉县将过去的乡约改名为区长，区之下的村长玉子巴什名称都没有改变。一些区长训练班毕业的学员，被县政府直接委任为正副区长，也没有经过选举程序。即使已经实行选举的县（局），如库尔勒县利用巴扎日选举区村长，也缺乏规范的选举方法和程序，选举的结果比较随意，如村长一职由各村的伊玛目兼充。

二、

从 1941 年 1 月至 10 月是新疆推行区村制的第二阶段。^[13]1941 年 1 月，新疆省民政厅根据国民政府《县组织法》结合新疆实际下发了“省府民字第 2705 号训令附办法一份”^[14]，确定在县级组织以下正式设立区村行政机构，并制订划分区村章程及具体划分办法。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着力于各县（局）区村的划分上，至于区村长的选任仍没有作出统一的规定。

伊宁县成为新疆编组区村的模范县。1941 年 1 月 30 日伊宁县政府召开首次农牧会议，伊犁行政区行政长官姚雄亲临会场，参加会议的有农牧场长、农会会长及农官乡约百余人，讨论拟订改组区村计划。^[15]伊宁县“根据地方环境及实际情形，划分全县为四个区和二十个村”^[16]。伊宁县还确定了各区村长的办公地址，改过去的乡约为区村长。乡约努力工作者继续留任，否则另选人员充当。^[17]

伊宁县属维吾尔族聚居区，它确立为模范县有力地推动着整个维吾尔族聚居区编组区村的工作。皮山县“考查各庄村户口，按当地环境实际的需要及各庄村的大小，地方的远近，并参照当地情形”，将全县划分八区，一百七十一村。^[18]洛浦县 1941 年 7 月“依奉政府会颁划分区村制章程之规定，业经进行划分区村工作告竣，呈报在案”^[19]。和阗县 1941 年 7 月奉令实行区村制，全县分为八区，“已经呈报在案”^[20]。墨玉县“拟将县境划分八区，就其区域小大，每区酌设正区长一人、副区长一人或两人。每区应设村长若干”^[21]。麦盖提县原拟根据旧有组织在庄下设村以替代区村制，新疆省政府明确予以否决。^[22]1941 年 3 月麦盖提县县长许亮、副县长纳买提呈文盛世才，报告“县应该分为二区，第一区转村十八，第二区转村二十一，于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六日，亲赴各村召开村民大会选举正副村长，当众选得沙吾阿吉等担任正副村长，三月七日在村长会议上，当众选得买买提阿吉等担任第三区正副区长，所有伯克玉子巴什可克巴什名目一律取消”^[23]。

这一阶段区村长的选任没有统一规范，区村长的撤换自然也无章可循。我们以皮山县为例，可以看到正副区长的撤换比较随意，撤换的理由也有以下多种：1.欺压民众。皮山县的帕尔满副区长、装桂正区长，“均系马逆^[24]时代之乡约，旧习不改，仍有压迫民众情事”。和阗区行政长委派的叶城、皮山两县的视察委员妥其昌、札克忠上报这一情况，和阗区行政长令皮山县政府“应立即查明撤换”^[25]。皮山县政府撤去三区副区长沙衣木职务，原因是“筑路绑打民众，屡戒不悛，有违和平政策”，“遗缺委米阿西木接充”。又六区辟尔漫庄副区长买买提，“压迫民众，对于政府工作多不忠实”，也被撤职。“遗缺以巴改毛拉接充”^[26]。2.工作不力。“第一区区长买买提怠工职责，现经撤差；遗缺查有该区副区长达吾提办事认真，即以升充；所遗该区副区长一缺，查有喀吾孜堪以接充。”“再查第四区区长衣明工作不力，现经去职，降充副区长，即以第四区副区长一缺补充以观后效；其第四区区长遗缺，即以第二区区长买买提调充；所遗第二区区长一缺，查有哈生木努力工作，堪以接充。”3.缺乏能力。皮山县“第三区区长库旺无有担负区长责任之能力，现经去职，拟另委以相当职务。遗缺查有该区副区长米阿希木堪以升充，所遗该区副区长一缺，即以第四区副区长克里木调充”。4.年龄大。皮山县“第五区区长托合大现因年老去职休养，遗缺查有阿布执西提堪以接充”。5.另委职务。皮山县第五区“副区长阿皮孜因拟另委相当职务去职，遗缺即以沙衣木接充”^[27]。

实施区村制的第二阶段有以下显著特点：1.虽然区村的划分有了统一的标准，但区村长的选用仍没有统一的规范，有些县（局）仍直接改过去的乡约为区村长，而有些县（局）则实行民选区村长。2.民选区村长的方式和程序已较第一阶段科学、规范，首先由县政府派员深入各村召开村民大会，选举出正副村长，然后召开村长大会选举出正副区长。在第一阶段没有废除的“玉子巴什”等旧有名称，在第二阶段也被完全废除。3.由于民选区村长的规定没有统一实行，所以区村长的撤换也就不可能规范。如皮山县的撤换理由不管是事实还是托词，都透出随意性。

三、

从1941年11月至1942年底是新疆实施区村制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区村制在维吾尔族聚居区的普遍实施阶段，也是民选区村长的规定正式确立阶段。

1941年11月1日新疆省政府民政厅正式颁布实施了由毛泽民亲自起草的《新疆省区村组织章程草案》^[28]。草案不仅规定了区村划分的标准和原则，而且还就区村长的选举作出了专门规定。“村长之选举应按各村人口之多寡，公选名望素孚、办事公正之代表五人至十一人，由代表中互选一人为村长。区长、副区长之产生由该区村代表大会选举之。”“区长任期二年，副区长及村长任期一年，如连选得连任。”该草案除“选举方式应由各县局斟酌地方情形用民主集中制办理之”^[29]外，其他方面如候选人条件、选举程序等方面都有明文规定。这些规定便于各地区村长选举的具体操作，也便于各地民选区村长的条件和程序整齐划一。虽然毛泽民后来离开民政厅长的岗位，但区村长的任职条件及选举程序等规定基本延续下来。^[30]

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各县（局）基本按照新章程的规定进行了区村长的选举。如洛浦县第五区民司马益被“公推”为第一区区长。^[31]到1942年底，新疆全省有50多个县（局）实行了区村长制，选出了区村长。^[32]《新疆省区村组织章程草案》的其他规定也得到认真执行。如区村长当选证书格式由民政厅制订，区长、副区长的当选证书由民政厅颁发，村长当选证书由该管县政府填发报民政厅备查等相关规定，都被一一执行。如和阗县呈请民政厅颁发补选正副区长当选证书，民政厅“准予所请，当选证书随令颁发”；和阗县要求“预发村长当选证书”一节，民政厅答复“未便照准，如有更换调动时，再行呈请颁发”^[33]。

被免职的正副区长如何增补,《新疆省区村组织章程草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增补的正副区长,也要经过“民主选举程序”。如和阗县1943年9月一次撤职了9名正副区长,“遗缺”要“经民众推选”,副区长升任区长也要由民众推选。增补正副区长证书,同样由各县(局)将“各正副区长履历造表具文呈请”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鉴核”,“俯赐转发给当选证书”^[34]。

也有个别县(局)不经过民选增补正副区长的个案发生。如洛浦县第五区区长司马益因“请假离职”被“无故撤差”,由“民众并未公举”的易甲甫担任区长。和阗区行政长官接到司马益的上告信后当天批示,“飭该县查明具复”^[35]。告状人强调易甲甫没经过民选,行政长官也要求洛浦县“查明具复”,这说明不经过民众推举增补正副区长不符合规定。但这一阶段民选区村长的规定也有明显的纰漏:一是县政府可以不经任何程序随意罢免民选的正副区长,二是民众没有罢免区村长的权力。

关于县政府可以随意撤换正副区长的情况我们以和阗县为例:和阗县“属第二区区长吾布哈四禾、第一区副区长买买日衣木、第五区副区长库万尼牙子、第七区副区长托乎大尼牙子等,工作不力撤除;又第七区正区长阿西木、副区长买素木、第三区正区长沙的尔等因病长假;又第三区副区长买买肉子因工作不力撤差;第八区副区长买买尼牙子因案撤差。以上各正副区长遗缺,经民众推选第六区副区长的调充第二区正区长,阿不拉为第一区副区长,有第四区区长尼牙子调充为第五区副区长,前农会会长买买土的为第四区正区长,权拉为第七区副区长,衣明为第七区正区长,托合大尼雅孜为第七区副区长,中训团毕业后回到和阗的学员库万尼牙子为第三区正区长,第一区副区长阿不都瓦力哈日调充为第三区副区长,遗缺以前农会副会长巴拉权为第一区副区长,第二区副区长根克调充为第八区副区长,遗缺由借甫为第二区副区长”^[36]。在和阗县撤职的9名正副区长中,因“工作不力”被撤职的人数多达5名,“因病长假”撤职的3名,“因案”撤职的1名。“工作不力”是一个抽象、模糊的评语,容易被上级机关用作清除异己的借口。一旦县政府对民选的正副区长不合意者,就可以不经任何民意程序随时撤换。表面上看县政府没有选择正副区长的权力,但通过随意撤换方式事实上拥有着这项权力。

民众没有罢免区村长的权力,我们可以通过和阗行政区的一件“要案”予以推定。洛浦县塔瓦克派出所上报洛浦县警察局一桩案件,称新塔瓦克庄有“地痞”牙合甫、阿不都肉甫、托合大什、努尔等人,于1943年4月3日当着“农进会长易甲福伯克”及“大众”的面,说他们的区长塔力甫阿吉“是帝国主义走狗”,“脱离他好像脱离日本一样”,为此他们“计划另选区长”。塔瓦克派出所对该“地痞”等进行分别传唤,他们对上述“罪行”供认不讳。“犯罪”原因是区长派差修路、开渠,“又催收税钱”,他们“受不了这个痛苦”。派出所查证区长派工,“系奉县长命令,由工商会开辟新渠之用”;“催收税务亦是区长应负的责任”。“而该地痞等藉此不满,乘机另选区长,以遂其愿,殊属非是。”洛浦县警察局对该案复查“属实”,上报和阗区警察局予以“核示”。和阗区警察局认定“该牙合甫等以政治名词辱骂区长,殊为不合”,并“呈请”和阗区正副行政长官“鉴核核办施行”。虽然该案的最终裁决结果我们未找到相关档案材料,但从洛浦县警察局、和阗区警察局的态度观察,区长即政府的化身,“辱骂区长”是“地痞”,“另选区长”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民众不可能拥有罢免区村长的权力。

综上所述,盛世才在维吾尔族聚居区推行区村制时,逐步实行了民选区村长的制度。尽管民选区村长的规定还称不上完善,如所谓“民选”说到底还是地方豪绅操纵“民意”,民众没有罢免区村长的权力,依然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上级政府可以随意撤换区村长实质是对“民意”的任意否决。但我们不能据此否定盛世才实行区村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区村长由民选产生,树立了区村自治的初步基础,这是现代化行政的一个基本特征,^[38]也是维吾尔族聚居区民主政治巨大进步的生动体现。

参考文献:

- [1]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维吾尔族乡村政权研究（1884～1949年）”（项目编号：09BZS036）的阶段成果。
- [2] 陈芸，张皓：《盛世才执政时期新疆区村制探析》，《西域研究》2011年第4期。
- [3] 陈芸，张皓：《金树仁对国民政府〈县组织法〉践行初探——以〈新疆省政府公报〉为中心的考察》，《新疆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 [4] 李英奇：《浅谈新疆多年来的民政工作》，《反帝战线》1940年第3卷第4期。
- [5] 《库尔勒召开全县农民大会参加群众五百余，改定农村组织并组水利委员会》，《新疆日报》1940年6月8日第3版。
- [6] 叶城县维吾尔族忙苏的履历写明，1939年担任棋盘区区长。说明叶城县1939年改乡约管辖地为区了。参见《叶城县政府造资选送第三期政治干部训练班学员简明履历表》（民国30年11月30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61，《旧和田行署、新疆省府、各县府：各县呈报送省政干班学员名单、履历，各县救济院人事的呈件、批件等》（民国30年）。
- [7] 和阗县维吾尔族日乎板尼牙孜的履历写明，1939年9月考入区长训练班，1940年1月毕业，“委九区区长”，1941年8月“调委五区区长”。说明1940年1月前和阗县已经改乡约管辖地为区了。参见《和阗县日乎板尼牙孜简历》，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61。
- [8] 皮山县维吾尔族达伍提的履历写明，1939年和阗区区长训练班毕业，1939年“充皮山县第一区副区长”，1940年“升充第一区区长”。皮山县维吾尔族土合生1940年担任皮山县“四区区长”。这些说明1939年和阗县已经改乡约管辖地为区了。参见《皮山县政府造资选送第三期政干班学员简明履历表》（民国30年11月27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61。
- [9] 洛浦县维吾尔族司马益的履历写明，1938年“充当街长”，1940年8月“充当副区长”。皮山县维吾尔族业吉米丁，1939年“入区长训练班”学习，1940年“充当第一区区长”。这些说明洛浦县至迟在1940年以前已经改乡约管辖地为区了。参见《新疆和阗区洛浦县选送政治干部学员履历简明表》（民国30年12月），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61。
- [10] 《呈报遵令组织区村长及划分区数请核备查由》（民国30年2月12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61。
- [11] 何耿光：《新疆过去与今后的干部训练》，《新新疆》1943年第一卷第1期。
- [12] 《皮山县政府造资选送第三期政干班学员简明履历表》（民国30年11月27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61。
- [13] 陈芸，张皓：《盛世才执政时期新疆区村制探析》，《西域研究》2011年第4期。
- [14] 《呈报遵令组织区村长及划分区数请核备查由》（民国30年2月12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61。
- [15] 《伊宁县召开首次农牧会议姚司令兼行政长亦亲临训话》，《新疆日报》1941年2月13日第3版。
- [16] 《伊犁区伊宁县政府试行新区村制暂行办法大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政字2—6—906卷；转引自陈芸，张皓：《盛世才执政时期新疆区村制探析》，《西域研究》2011年第4期。
- [17] 《伊宁二次县政会议划全县乡村为区村并派员加意保管渠口》，《新疆日报》1941年3月30日第3版。
- [18] 《皮山县划一区村制》，《新疆日报》1941年7月25日第3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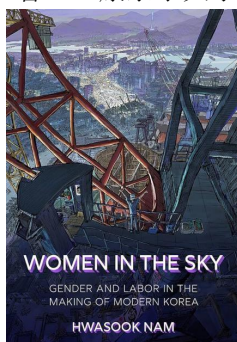
- [19]《为呈报区村制组织日期及选考区村长花名表由》（民国31年3月15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62，《旧和田行署、各县府：关于救济院、社会救济等的清册、章程等》（民国30年12月至民国31年12月）。
- [20]《为拟呈报奉令组织区村制情形及选各区村长履历表由》（民国31年2月25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74，《旧和田行署、各县府：关于区村制组织章程、参加区村长训练班人员名单、履历表、孤贫年报、清册》（民国31年）。
- [21]《呈报遵令组织区村长及划分区数请核备查由》（民国30年2月12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61。
- [22]《呈为呈转事据麦盖提县政府呈称呈为呈请职县拟在庄以下设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政字2—6—905卷，转引自陈芸，张皓：《盛世才执政时期新疆区村制探析》，《西域研究》2011年第4期。
- [2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政字2—6—602卷，转引自石向焘：《民国时期新疆基层政权研究》，2008年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30页。
- [24]“马逆”是指马虎山。1934年7月马仲英反抗盛世才失败后出走苏联，所遗36师部队由代师长马虎山与盛世才达成协议，将和阗一带划为马虎山的防区。自此东起若羌，西至叶城，包括和阗、于阗、策勒村、墨玉、洛浦、皮山、叶城等7县和赛拉图设治局归马虎山统辖。1937年驻守喀什区的步兵第6师师长麻木提叛乱，马虎山响应。马虎山兵败后，这一地区由新疆省政府直接管辖。
- [25]《为代电飭查撤帕尔满副区长装桂正区长并将木吉区长养廉地归官产报查由》，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45，《旧和田行署、各县府：关于各县呈报的区、村、乡公所情形及孤贫、失业人数调查表等》（民国29年至34年）。
- [26]《一件呈报撤换三区、六区副区长由》，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40，《旧和田行署、各县府：关于各种宣誓词、乡镇、民政选举国大代表等事务的指、训令、呈件》（民国34年至民国38年）。
- [27]《呈报调换各县区长由》（民国29年6月4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40。和田地区档案馆注明这个卷宗是民国34年至民国38年的文件显然有误，因为该卷宗中包含有民国29年的文件，如本注释文件即是。
- [28]《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草案》（民国30年11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编：《民国时期新疆省组织人事制度档案史料选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20页。张大军说：“在二期三年计划的第三年（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颁布了《区村制组织章程》”，显然有误。参见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八），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4357页。
- [29]《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草案》（民国30年11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编：《民国时期新疆省组织人事制度档案史料选编》，第13~14页。
- [30]李英奇接替毛泽民暂行兼代民政厅长后，对毛泽民制订的区村长任职条件做了一些微调，如原先规定的村代表的当选条件是“名望素孚、办事公正”，区村长均在村代表中产生，区村长自然也是这个条件。李英奇1942年11月6日规定“嗣后对于推选区村长，首先应以公正、忠实、富有声望之人士为原则”。候选人的条件增添了一项“忠实”，至于选举程序等规定，仍沿用过去的规定。参见《据该县呈请补发正副区长当选证书以利工作由》（民国31年11月6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37，《旧和田行署、各县府：关于民政事务有关指、训令，各县关于区乡街长等人事呈件》（民国32年）。
- [31]《稟词》（10月21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37。
- [32]《新疆通志·民政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民政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丛书《新疆通志》第24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页。

- [33]《据该县呈请补发正副区长当选证书以利工作由》（民国 31 年 11 月 6 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37。
- [34]《呈省府为呈请区长履历表请发当选证书由》（民国 32 年 9 月 16 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37。
- [35]《禀词》，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37。
- [36]《呈省府为呈请区长履历表请发当选证书由》（民国 32 年 9 月 16 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37。
- [37]《为转报洛浦县属新塔瓦克庄地痞牙合甫等要另选区长各节祈核办由》（民国 32 年 5 月 2 日），和田地区档案馆档案，全总号：J30,目录号：0001，卷号：337。
- [38]陈芸，张皓：《盛世才执政时期新疆区村制探析》，《西域研究》2011 年第 4 期。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 57 期

高空中的女性：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与劳工

Hwasook Nam （著）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21 年



书籍简介：《高空中的女性：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与劳工》探究了自 1920 年代以来韩国女性劳工的百年抗争史，聚焦于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中的性别政治。本书着重关注韩国（朝鲜）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中由工厂女工主导公众视野的多个重要时间点，包括 1930 年代初平壤橡胶鞋厂工人大罢工、1950 年代初韩国纺织工人斗争、1970 年代女工领导的民主工会运动，以及近几十年来女工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运动。

在对这些历史时期的回顾中，作者 Hwasook Nam 发问：韩国女工为本国百年来不屈不挠的工人运动和成功的民主运动做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为何她们会在抗争运动和主流话语中被贬低为边缘角色？《高空中的女性》正视了她们不懈的抗争行动，以高空静坐——韩国女性劳工独特的抗议方式——作为书名，开始于讲述 1931 年橡胶鞋厂女工姜秋荣（Kang Churyong）的静坐抗议，结束于今日韩国工人运动中许许多多用相同方式表达抗争的女性（如金镇淑）的故事。

Nam 尝试理解韩国女工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并试图修正那些使其隐身的社会历史叙事。在书中，她将性别和阶级作为主要分析范畴，以女性工运者的视角对二十世纪韩国的国家建构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反思。

本书获得了：

-2023 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詹姆斯·帕莱斯图书奖（James B. Palais Book Priz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22 年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东亚历史研究图书奖（The John K. Fairbank Prize in East Asian history since 1800,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作者简介：Hwasook Nam 是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兼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荣休副教授，曾是韩国研究项目和韩国研究中心的核心教员。她的研究兴趣包括二战后现代韩国的劳工、性别和思想史。她出生于首尔，在首尔大学韩国历史系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北美地区韩国研究奠基人之一詹姆斯·帕莱斯（James B. Palais）教授，并成为第一位詹姆斯·帕莱斯讲席教授。她的博士论文《造船立国：朴正熙时期的韩国民主工会联盟》（*Building Ships, Building a Nation: Korea's Democratic Unionism under Park Chung Hee*）在 2009 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 2011 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詹姆斯·帕莱斯图书奖。《高空中的女性：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与劳工》是她的第二本著作。

书籍介绍：关于韩国工业化进程的叙事往往将其与上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且常常只关注参与该进程的男性行动者，如政治家、技术官僚、工程师和企业家等。而 Hwasook Nam 在《高空中的女性》中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一段可以追溯至上世纪 20 年代的韩国工厂女工抗争史，当时的韩国工业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刚刚萌芽。

与郑喜载（Janice C. H. Kim）的《为生活，为工作：殖民时期的韩国女工》（*To Live to Work: Factory Women in Colonial Korea*, 2009）和 Soonok Chun 的《“他们不是机器”：韩国女工及其 20 世纪 70 年代民主工联主义斗争》（*They Are Not Machines Korean Women Workers and their Fight for Democratic Trade Unionism in the 1970s*, 2003）等作品类似，本书重新审视了殖民时期朝鲜和后殖民时期韩国女性领导的工人运动，而这段历史在之前的主流叙事中被视为缺乏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础的、民众对物质贫困的简单回应。

同时，本书也向读者展示了韩国女工的能动性，说明她们不只是被资本家、国家和父权制体系压迫的受害者，更是在工业化进程中获得新身份的体力劳动者。如同鲁斯·巴勒克拉夫（Ruth Barraclough）在《文学中的工厂女孩》（*Factory Girl Literature*）做的那样，作者证明了这是重新认识二十世纪韩国的有力视角。

在本书的前三章中，作者回溯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初殖民时期的平壤橡胶鞋厂工人运动。第一章介绍了橡胶厂罢工及其领导人之一姜秋荣，将平壤橡胶产业及其劳工置于殖民工业化进程和工人运动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同时，通过对平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分析，作者也揭示了罢工的核心主题——女性劳工的工资问题——是如何与平壤民族主义精英的内部分歧交织在一起的。

第二章考察了姜秋荣与当地共产主义运动间的联系，当时后者正在集中资源以组织各产业劳工形成革命性的工会联盟。作者探究了当代妇女运动如何将自己定位于女性产业工人和劳工问题，在其中新一代受过教育的“新女性”正在崛起，她们参与地下活动，将橡胶和纺织工厂的女工组织起来。在本章最后，作者也讨论了文学作品中橡胶女工活动家的刻画。

第三章回顾了民族主义新闻媒体中的女工形象。这些资料反映了社会对女工看法的改变，展示了女工中出现的新意识和主体性。随后，本章考察了平壤橡胶厂罢工的余波，其中包括建立一个工人所有制工厂的大胆尝试。最后，作者讨论了姜秋荣如何在大众记忆中留下身影。

在本书的后半部分，作者转向了进入后殖民时期的韩国。在殖民统治的最后十年，随着日本帝国迅速将自己的殖民地朝鲜变成了战时的军事供应基地，经济和社会发生激烈的转型，劳工活动变得几乎不可能。该时期形成的现代化和抵抗经验，包括社会运动，持续对后殖民时期国家建构的进程施加重要影响。战时殖民政府和特定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共同强化了一种为建设国家/帝国形成劳资合作的意识形态，并在很大程度上型塑了韩国解放后数十年内工人自身的期望和反共劳工运动的方向。

第四章聚焦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釜山纺织工人罢工，这场纠纷最终推动了一系列相对进步的劳动法在 1953 年的国会通过。与二十年前的平壤橡胶厂工人罢工相同的是，女工再一次在纺织厂纠纷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可和尊重。然而，这次纠纷的过程和效果与橡胶厂罢工有很大不同。后殖民时期的国家建设进程促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劳动-资本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由男性控制的劳工组织以巩固男性工人的权利和利益为目标，而这一过程往往是以牺牲女性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作者在第五章中探究了 20 世纪 60 到 80 年代处于发展阶段的韩国，聚焦于 50 和 60 年代逐渐巩固的劳资关系系统（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造成的影响，特别是从 60 年代开始的劳工运动中男性养家模式（male breadwinner model）和家庭生活工资（family living wage）话语的制度化，这使得女工的可见度逐渐下降。之后，作者探究了上世纪 70 和 80 年代的女工如何建立草根组织并形成批判意识和行动，以应对她们在工作中面临的性别歧视。除此之外，就像殖民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意识到了女工的革命潜力，由此出现了新一代的学生劳工组织者，形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所谓的“工人-学生联盟”（nohak yǒndae），使 20 世纪 70 年代劳工运动的记忆政治变得更加复杂。

第六章关注韩国在 1987 年后经历的民主化和新自由主义转型的后发展阶段，并考察了那些使女工及其贡献在当下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和广泛社会中隐身的社会条件。本章聚焦于 20 世纪 90 年代釜山鞋厂女工对资本外逃的反抗，分析了 1987 年工人运动（Great Workers' Struggle）前后工会运动中的性别政治动态。在这一时期，企业为了减少开支并重获车间控制权，出台了新型管理战略试图削弱工会力量，使得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工人通过大规模罢工浪潮取得的成果被严重侵蚀。同时，新自由主义原则指导下的经济重整使女性工人更容易沦为不稳定劳工，而组织化的劳工运动却一直聚焦于男性在新自由主义转型中受到的伤害。

直到 21 世纪初，韩国的工会运动才开始关注日益严重的临时工问题，但在转型时期表现出来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或者说深植于历史中的劳动市场性别区隔，却一直没有得到严肃处理。同时，处于劳工运动边缘的女性临时工已经成为反抗斗争的领导力量，她们凭借坚持和才能形成的广泛团结和创造性文化实践又开始引起社会关注和同情。

本书是一部讲述横跨各行业的工人运动的工人历史著作，而非工业或技术史学家们可能期待看到的一段特定行业或企业的劳工史。作者在书中很少关注那些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型塑女工主体性的影响因素，如车间里的具体生活、组织劳动的方式、各行业的特殊性（如招工方面）、劳动过程和工厂文化。不过，即使对那些想了解劳工历史中的具体细节的人来说，本书的分析也具有启发性。Nam 不仅看到了劳工历史中韩国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更提醒读者阶级和性别这两个变量在韩国劳动组织形式和国家建设进程中常被忽视的重要作用。作者在书中关注的主题——女性作为市场中的劳动者，在男性主导的职场中为追求自己的目标、改善女性困境而付出努力——仍在现代社会中持续上演。

本文采编整理自：

Nam, H. 2021. *Women in the Sky: Gender and Labo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Kore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ee, Y. 2024. Review of the book *Women in the Sky: Gender and Labo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Korea*, by Hwasook

Nam. *Technology and Culture*, 65(1), 363-365.

延伸阅读：

Nam, H. B. 2011. *Building ships, building a nation: Korea's democratic unionism under Park Chung He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造船立国：朴正熙时期的韩国民主工会联盟

Kim, S. K. 1997. *Class Struggle or Family Struggle?: The lives of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South Korea*.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阶级斗争还是家庭斗争？韩国女工的生活

Yoo, T. J. 2008. *The politics of gender in colonial Korea: Education, labor, and health, 1910–1945* (Vol. 3).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殖民时期朝鲜的性别政治：教育、劳动和健康

Kim, J. C. 2009. *To Live to Work: Factory Women in Colonial Korea, 1910–1945*.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为生话，为工作：殖民时期的韩国女工

Soonok, C. 2017. *They are not machines: Korean women workers and their fight for democratic trade unionism in the 1970s*. NY: Routledge. “他们不是机器”：韩国女工及其 20 世纪 70 年代民主工联主义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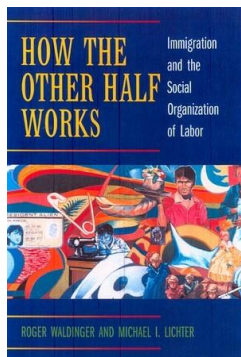
（编译：李笠箫，责编：吕想，排版：胡琼）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 58 期

另外一半如何运行：移民及其劳动力的社会组织

罗杰·沃尔丁格（Roger Waldinger）、迈克尔·利希特（Michael Lichter） 著

加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



书籍简介：《另外一半如何运行》解开了有关美国当代移民的一个谜团：为什么一个越来越高科技的社会，会需要那么多缺乏基本技能的移民？

沃尔丁格和利希特以明晰而引人入胜的风格，提炼并分析了那些能解释这一谜题的关键因素。聚焦于当今移民美国的首选之城洛杉矶，这本书深刻地揭示了新经济的另一面，即雇佣不是找到“同类”，而是找到“合适种类”来做那些受人鄙视但又不可或缺的工作。

作者简介：罗杰·沃尔丁格（Roger Waldinger）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国际移民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还是应许之城吗？后工业时代纽约的非裔美国人与新移民》（Still the Promised City? African-Americans and New Immigrants in Post-industrial New York）（1996），该书赢得了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罗伯特·帕克奖。

迈克尔·I·利希特（Michael I. Lichter）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书籍介绍：《另外一半如何运行》是对当代美国移民与新劳动力市场关系的研究。本书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当今的经济还需要如此高比例的低技能移民劳动力？在高科技行业削减低技能岗位、非裔美国人就业困难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显得尤其令人困惑。基于实地研究，作者在支撑美国经济运行的社会过程中找到答案。该书将洛杉矶的低技能劳动力市场描述为 21 世纪美国的一个缩影。

本书广泛探讨分析了低技能工作的性质、社会网与招聘流程如何决定谁被雇佣，以及职场中族群偏好是如何形成的。引言对有关劳动力市场运作的理论进行了回顾，展示了“糟糕的工作”是如何能吸引移民的。新移民的参照框架是他们离开的国家，更关心的是美国的工资是不是比他们离开的地方高，而不是该工作可能带来的污名。沃尔丁格和利希特指出，雇主和工人经常在社交上相互隔离，即使他们拥有相同的族群背景。

本书的第一章介绍了全书的总体内容和研究问题。第二章“雇主想要什么”探讨了 21 世纪劳动市场的变化，强调了在技术先进的经济体中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时探讨了在城市地区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尽管与这些新市场需求似乎不匹配、却依然保持高就业率的悖论。

第三章涉及工业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一些工作要求求职者有更高的教育水平，而另一些则对教育水平要求较低？雇主为何需要外国劳动力，包括那些高学历的博士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者？沃尔丁格和利希特区分了识字能力、沟通能力和与工作相关的技能，并强调英语糟糕、受教育程度低以及对美国文化不熟悉的移民仍然可能通过社交网找到工作，并因其“友好、热情、顺从”的“个人资质”更被一些雇主青睐。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涉及的大多数工作场所，除了医院外，都不要求英语能力和高中学历。尽管商店、酒店和餐厅的经理强调工人要能“与顾客互动”，餐厅经理表示，新员工只需要八天时间掌握工作要领。

当沃尔丁格和利希特更详细地研究工作要求时，他们发现在制造业中，（除了身体素质之外）最需要的是与同事相处的能力。工作不仅是要把事情做好，更是一个社会过程，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新员工大部分都需要老员工来带，因此和老员工相处融洽非常重要，他们会教给新人具体做某件事的窍门，也会告诉新人如何用巧劲来操作某一台机器。移民网络非常适合建立这种相互支持的劳工力量；在这种力量中，工人的社会品质比他们的技能更为重要。通过对多个工作的田野调查，沃尔丁格和利希特解释了移民网络如何很快地“占领”某些工作场所，使不懂工作场所语言的本地工人难以立足。总之，在找工作时，社会学家的“社会资本”比经济学家的“人力资本”更为重要。

第四章转向语言，回顾了过去的移民会英语是因为他们必须与工作中的主管互动：英语是工作和获得更高工资的关键。然而，族群聚居区的移民因为不必与外人打交道而没有感受到什么英语学习压力。如果有足够数量的讲同一种语言的移民，比如在有大量墨西哥移民的农场，主管会适应工人，学会西班牙语。洛杉矶地区大多数零售商店和医院要求与客人互动的员工要懂英语；对于许多人来说，双语能力是一个优势，有些公司还会给懂双语的员工每小时额外 10% 的工资。

第五章是对有关社会网的文献的优秀总结。本章强调社会网既提供信息和影响力（使某些人在找工作时处于内部优势地位），也创造了可能成为个体、网络和工作场所之间的隐性契约的义务。社会网的起点是移民们在移民之前建立的关系。最先移民的人到国外后，网络开始发挥作用，它可以传递各种信息并提供即时的帮助。网络也可以成为一种工具，帮助雇主更有效地跨越边界寻找工人，而不是只在几个街区内找工人。

第六章和第七章将理论应用于数据，首先观察到几乎所有移民员工都与囊括了所有找工作的人的社会网相连。社会网导致一个工作场所的大部分工人来自同一村庄，有时甚至来自同一家庭。它们可以创造对外人封闭的准社区（quasi-communities）。一些雇主反对由此产生的裙带关系，担心“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大多数雇主适应了它，认为它会带来能够胜任工作的员工，毕竟他们经过了当前员工的预先筛选。

沃尔丁格和利希特发现，大多数雇主都赞同一位家具制造商的观点，认为白人和亚裔是最好的工人。白人是因为会英语和做事灵活，亚裔则因为刻苦耐劳。拉丁裔移民被认为是次一级的，因为他们虽然能够在长时间内做乏味而重复的工作，但不会英语做事也不灵活；“他们渴望的就业标准与美国当地人的期望不一样”。黑人由于“态度不好”和“缺乏灵活性和热情”而位于最低层。雇主强调，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第二代拉丁裔更像黑人，而不是拉丁裔移民，比如当被要求做某事时，他们会迅速说“这不是我的工作”。

第八章“雇主想要什么”探讨了美国雇主在多样化的劳动市场中如何基于种族和民族偏好来选择员工，分析了这些偏好如何影响低技能劳动力的职业机会，并挑战了传统关于种族歧视的社会科学理论，指出雇主的选择不仅仅是出于偏见，而是基于对工作履行和管理易性的考量。第九章“我们”与“他们”探讨了雇主如何区分“我们”与“他们”，以及这种区分在低工资劳动市场中如何影响对劳动力的选择和分类，特别是如何根据美国化的标准和外籍身份来评估适合困难和低报酬工作的人选。第十章讨论了雇主如何在各种内外部压力和偏好中、特别是在种族和民族多样性的背景下选择员工。章节深入探讨了组织内部的社交网络如何影响招聘决策，以及如何通过社交闭环来维护或排斥某些群体，同时也探索了顾客偏好和组织结构如何影响这些动态。

第十一章转向黑人与移民之间的工作竞争。引用一个受访经理的话来说就是“没有竞争”，因为“只有西班牙裔申请这些工作”。沃尔丁格和利希特得出结论：“大规模的移民涌入对技能较低的非裔美国工人没有任何好处”，并指出存在“一个不断强化正反馈过程，增大了雇佣黑人的难度”。

本书以对一个悖论的讨论作为结尾：存在着糟糕的工作，以及渴望做这些工作的移民；他们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子女则回避这些工作；社会网发展成占领特定工作场所和维持低技能移民供应的工具。移民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他们的双重参照框架和较低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填补其他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的理想候选人”。

本书引人入胜且信息丰富，提供了有关低工资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的深刻见解。其分析和发现对于理解美国的“新经济”至关重要。美国人对新移民可能有强烈且矛盾的情感，但正如这本书所明确显示的，美国雇主无法离开他们。

本文采编整理自：

- Hondagneu-Sotelo, Pierrette. 2003. “Why Employers Love Immigrants: How the Other Half Works: Im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abor by Roger Waldinger and Michael I. Lichte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276 Pages.” *Contexts* 2 (4): 65–66.
- Martin, Philip. 2004. “Book Review: How the Other Half Works: Im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abo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8 (3): 1256–1258.
- Lobel, Orly. 2009. “How the Other Half Works: Im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abor.”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1 (3): 511–514.

延伸阅读：

- Waldinger, Roger David. 1999. *Still the Promised City?: African-Americans and New Immigrants in Postindustrial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还是应许之城吗？后工业时代纽约的非裔美国人与新移民》
- Mattingly, Doreen J. 2001. “The Home and the World: Domestic Service and International Networks of Caring Labor.”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1 (2): 370–386. doi:10.1111/0004-5608.00249. 《家与世界：家庭服务与国际看护工作的网络》
- Meyer, Ruth, and Huw Vasey. 2020. “Immigration,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Emergence of Ethnic Segmentation in a Low-Skill Labor Market.”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38 (4): 387–404. 《移民、社交网络与低技能劳动市场族群分化的出现》
- Rodriguez, Nestor. 2004. “Workers Wanted”: Employer Recruitment of Immigrant Labor. *Work and Occupations* 31 (4): 453–473. 《招工中：雇主招募移民劳工》
- Cranford, Cynthia J. 2005. “Networks of Exploitation: Immigrant Labor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Los Angeles Janitorial Industry.” *Social Problems* 52 (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K: 379–397. 《剥削网络：移民劳工与洛杉矶清洁工业的重组》

（编译：韩燕钧，责编：吕想，排版：胡琼）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407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hehui.pku.edu.cn/second/index.aspx?nodeid=1820>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